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www.duxiu.com

中 共 网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五公大队村史编写组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4³/₄印张 94千字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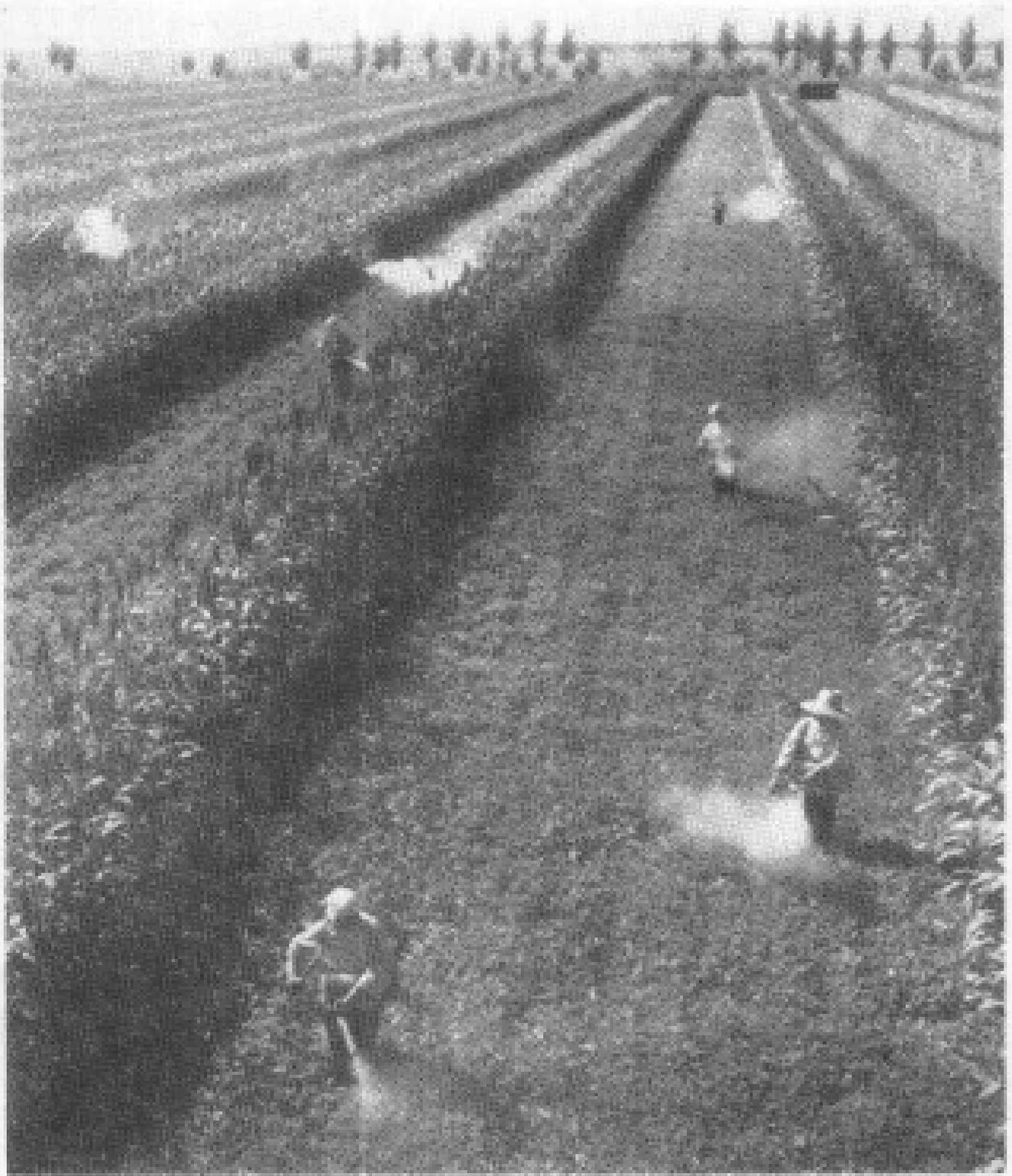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018·746 定价：0.31元



“老四户”在一起学习



耿长锁同志在劳动休息时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除虫小分队正在喷治虫害



耿长锁同志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



棉花丰收



耿长锁同志和大队技术员鉴定小麦品种



麦收场上忙脱粒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灾难深重的旧五公	3
苦难岁月	3
不屈的斗争	10
第二章 抗日烽火	16
发动群众	16
摆开火阵烧野牛	20
第三章 组织起来	30
“土地合伙组”的诞生	30
在斗争中成长	33
退组风波	38
“咱们坚决不散”	42
第四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45
砸碎封建铁锁链	45
保卫胜利果实	51
第五章 在斗争中发展的初级社	55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55
和富裕中农竞赛	59
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62
粉碎篡权阴谋	64

	迈出新的一步.....	67
	砍不倒的合作社.....	69
第六章	高级社的诞生.....	77
	一场伟大的变革.....	77
	高级社的优越性.....	83
	关于两条道路的一场大辩论.....	88
第七章	人民公社好.....	93
	革命闯开跃进路.....	93
	欢庆公社成立.....	96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99
	党的基本路线指航向.....	107
	自力更生结硕果.....	112
	在四清运动中.....	11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奏凯歌.....	122
	伟大的革命 战斗的洗礼.....	122
	一个朝气蓬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130
	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135
	一代新人一代新风.....	137
	集体经济飞跃发展.....	141

前 言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公社五公大队，是开放在华北农村的第一枝社会主义之花。一九四三年冬天，五公村以耿长锁同志为代表的四户贫苦农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合伙组”，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当时正是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合伙组，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庆祝五公集体化二十周年而发表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民主革命阶段办起这样一种具有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生产合作社，在个体经济茫茫大海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阵地，这应当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可贵的试验。”

五公人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已经三十四年了。这三十四年，是五公村天地翻覆的三十四年。过去，五公“五沟十岗土质薄，风沙虫旱年年遭”，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土地合伙组诞生以来，五公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逐步改变了自己家乡的面貌。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资产阶级司令部，五公更加呈现出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社员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基本

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园田化,在一九七五年遇到少见的旱、虫、病灾的情况下,粮食亩产仍达一千二百八十七斤。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毛主席指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五公村的历史是一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三十四年来,五公人民每前进一步,都曾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其中有地富反坏右的造谣破坏,有城市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的冷嘲热讽,特别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耿长锁同志带领五公广大贫下中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妖风,斗恶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把五公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现在五公人民正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向更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

第一章 灾难深重的旧五公

苦难岁月

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河流纵横，沃野千里。饶阳县城就在它的中部，五公村位于县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地方。

五公村原是滹沱河流经的地方，千百年前，滹沱河改道，给这儿留下一片高凹不平的白沙地。以后，是从各地辗转而来的穷苦人披荆斩棘，用自己的双手把白沙滚滚、蒿草丛生的滹沱河故道开辟成良田，人们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五公村的每一亩土地，每一间房屋，都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五公人民一直处于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魔爪也伸到了冀中平原。它们不仅在这里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而且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以传教为名，在冀中一带遍设教堂，为帝国主义搜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情报。那时，五公周围的邹村、高桥、曹庄都有传教士的活动，他们和封建官僚勾结在一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欺压人民。五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贫穷困苦生活。

长期以来，五公村就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两户李姓地主(北李和南李)霸占着大部分土地,成为欺压五公人民的土皇帝和吸血鬼。早在百年前,北李大地主李天贵,占有一千多亩土地,北李大地主败落以后,南李大地主又成了五公村的一条地头蛇。他们勾结封建官府,有的还捐了个监生的头衔,霸占土地七八百亩。后来南李又分为八家,当地人们把这八户地主叫“八大院”。到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五公村共有土地四千四百七十亩,五户地主富农就霸占了约一千二百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一百零八户贫农只有土地四百七十亩,仅占全村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五。地主富农们利用手中霸占的大量生产资料,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正如当时五公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形容的:“地租象剃刀,租息高又高,苛捐杂税多如毛,穷人终年累断腰。”

五公村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租额一般都在全年产量的五成以上,多的达到七、八成。有的地主,把只有一口破土井的地当作菜园子租给农民,每年收租十五到二十块大洋,折成粮食就达六百斤到一千斤。除了地租剥削以外,地主还要对农民进行各种变相的盘剥勒索。当时穷人向地主租地都得先送很多礼物,不然就租不上地;就是租上了,到了第二年,地主还要借口土质改良,增加租额。在这层层剥削之下,穷佃户们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苦干一年,交完租子,剩不下几粒粮食,掺上糠菜,顶多能吃到来年春天。贫农徐僧一家七口人,有一年租种地主十亩地,这年发了大水,收成很少,地主却逼着按原数交租,徐僧的父亲把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上去,还是没有够数。狗地主闯上门来说:“没有粮食就拿地顶!”强迫他

家把仅有的三亩地卖了交租。秋收刚过，徐僧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为了活命，他父母只得忍痛卖了十三岁的妹妹，得了二斗红高粱当盘缠，带着徐僧兄妹四人逃到天津。徐僧在卷烟厂做工，其他人住在破席棚里，每天沿街乞讨。没有几个月，父亲病死了，小妹妹冻死了，大弟弟被国民党抓走。母亲和小弟弟被迫重返家乡，半路上，小弟弟又连饿带病死去了。徐僧一家就因为交不起地租，被地主老财逼得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高利贷是地主阶级勒逼穷人的又一恶毒手段。抗日战争以前，河北是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遇到荒年，五公村地主富农就大量囤积粮食，放债牟利，趁火打劫，对贫苦农民豪夺巧取。他们放出去的债有的月利竟达八分，借一百元，在十个月后就得还一百八十元，还不起，就利上加利。永远还不完的“阎王债”，成为地主套在贫苦农民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

一九二九年，五公村遇上大旱灾。站在村头，一眼望去，一片荒凉，寸草不生。在贫苦农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地主们却认为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他们狞笑着说：“地里不长囤里长；土里不长柜里长。”农民王玉章眼睁睁看着一家老小没吃的，托人向地主借了五十块银元。过了一年，地主来逼债，他被迫卖了儿亩地，才把债还上。谁知这一年一家连饿带病，相继死去四人。王玉章刚刚还过债，那里来钱埋葬亲人呢？只得再借债。想到再借债，王玉章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想起自己卖地还债，想起村里十几户贫苦农民被地主的高利贷逼得倾家荡产。他明知向地主借债是火坑，但也得往里跳，总不能让亲人尸体老停在家里呀！他只得找地主再借二

百元,地主满口答应了。可是王玉章接过钱来一数,却只有一百八十元。他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地主奸诈地说:“谁不知我家的规矩,这叫上交利。”从那以后,这一百八十元,本生利,利滚利,二年以后就变成了一笔三百五十元的要命债。一天,地主来到王玉章家说:“王玉章,借我的钱本息共合三百五十元,该还了吧!”王玉章指着自己的破房子说:“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哪还得起呢?再宽容几天吧!”地主瞪起眼睛,恶狠狠地说:“不行,今天你拿不出钱来,就得估产还债!”硬逼他典当了全部家产。王玉章估产还债后,大儿子逃到东北当童工,剩下老小不能远逃的,只能靠打短工讨饭过活。

地主富农对长工、短工的剥削也是极其残酷的。解放以前,五公村许多贫苦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有五、六十户靠给地富扛长活、打短工为生。扛长活的实际上就是被地主富农套上枷锁的变相农奴,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血汗被榨干为止。长工、短工的工资极低,许多时候甚至是只给“饭”吃,没有工钱。贫农徐庄,从十几岁就给地主扛长活,从地里到家里,一天要干十几小时牛马活,地主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徐庄长到成年,农活样样都会干,但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好庄稼汉,却常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更不用说结婚成家了,直到年老体弱,被地主一脚踢出门外。

地主的租、财主的债,压得农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而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对广大贫苦农民征收无数捐税,百般勒索。抗日战争以前,五公村贫苦农民每人每年交的“国税”、“地方税”、“地亩税”以及各种苛捐杂税,折合粮食要达三十多斤。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官差劳役。有一年,中农李连通

被土匪“绑票”，报告了地主武装“保卫团”。“保卫团”来了两个团丁，离村二里地朝天开了两枪，进村以后就要三十块银元的“子弹费”。李连通问道：“哪要这么多钱？”这两个团丁拿枪逼着李连通说：“不给钱，就跟我们走一趟。”真是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李连通没有办法，只得凑钱交了“子弹费”，不久就气疯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旧社会五公村的地主富农，对贫下中农不仅施行残酷经济剥削，而且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迫害。“八大院”之一的地主李化岐，占有一百七十多亩土地。他的哥哥李化南，是个万恶的土匪头，经常聚伙抢劫，奸污妇女，敲诈勒索。李化南同县里司法队长赵玉奇，又是磕头把兄弟。官府衙门和土匪恶霸互相勾结起来，为非作歹，行凶作恶，把五公村闹得暗无天日，阴森恐怖。

贫农李梅馨，有裁缝手艺，李化南叫他做了一件绸衫，不仅不给工钱，反而趁夜偷偷地把在北午村抢来的包袱扔在李梅馨的院子里栽赃。第二天一早，县司法队的狗腿子闯进李梅馨家，硬说李梅馨抢了北午村，把他抓进监狱，酷刑拷打，活活折磨死了。李梅馨的叔伯兄弟李常在，对此非常气愤，他在街上喊道：“这个年头，穷人的日子还有法过吗？”这一句话，闯了大祸。不久，李常在就被司法队抓了起来，惨遭毒打，最后被害得倾家荡产。

还有，贫农李占山的母亲和另一个贫农李祥，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李化岐一伙，也被栽赃抄家。有个贫农的孩子，在村上捋树叶，李化南见了，开枪就打。这些强盗，对贫苦农民的

欺压迫害，真是数不清，说不尽。

一九三五年地主李化岐想当村长，以便直接控制村政权，全村贫苦农民团结一致，粉碎了这个阴谋。李化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挑拨贫苦农民之间的团结，妄图把全村群众控制在他的手里，加强其反动势力。一天，他找到贫农徐敦，百般引诱拉拢，要徐敦在村里为他效劳。徐敦识破李化岐的阴谋，瞪着他说：“谁和你们瞎掺合！”李化岐恼羞成怒，心里暗暗打下鬼主意。秋收过后，徐敦交完了租，家里没吃没烧，孩子饿得直哭，只好把自己园子里的一点谷子割了回来。谷子刚刚推进家里，李化岐就带着县司法队的几个狗腿子闯进来，诬赖徐敦偷了他的庄稼，不容分说就把徐敦捆绑起来，关进监狱。李化岐还得意忘形的说：“穷小子想翻天，一亩地出一个大子儿，就得把徐敦点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孔孟之道是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从思想上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时候，在五公村，地主富农们经常宣扬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反动思想毒害人民，借以维护他们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地主豪绅用从劳动人民那里骗取的钱，大搞迷信活动，在村西修了菩萨庙，在村中建起关帝庙，在村东盖了天齐庙、三官庙，村北头建了龙王庙，一个不大的五公村，到处都是乌七八糟的“神庙”，逢年过节和遇上灾荒就让人们来烧香磕头，祈求祷告。神权和政权、族权、夫权，代表着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了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几大绳索。

抗日战争以前，五公村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和封建四权的束缚下，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里，祖祖辈辈受煎熬。

耿长锁是五公贫苦农民的一个代表，他的苦难家史，可以说是五公贫苦农民生活道路的一个缩影。

耿长锁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全家六口人。父亲在饶阳县城一家绳铺吃劳金(当工人)，给资本家当了十几年牛马，受尽了剥削压迫，后来带着一身病和一笔“阎王债”回到家里。在苦难生活的折磨下，耿长锁十几岁的姐姐早早的出了嫁，十四岁的弟弟只身跑到东北谋生，可怜的小妹妹在一年除夕晚上病饿而死。这悲惨的境遇，在耿长锁那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地富和资本家、对万恶的旧社会极其仇恨的种子。

耿长锁从七岁起，就分担了家庭劳动，和母亲一起租种着地主五亩三分地过日子。父亲从城里回来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常常好几天吃不到一粒粮食，眼看着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全家人的心象刀绞一般难受。一天，瘦骨嶙嶙的母亲拉过长锁的手，未说话泪水便象串珠一样流了下来。耿长锁心酸的说：“娘啊，别难过，有什么话就说吧！”娘看着他那未成熟的身体，抽泣着说：“债主天天来逼债，你爹又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呀？你是家里唯一靠山了，还是到城里去挣些钱糊口还债吧！”这样，耿长锁含泪来到饶阳县城，在狠毒奸猾的地主兼资本家董大车绳铺里当徒工。后来，耿长锁逐渐学会了打绳的手艺。董大车绳铺里共有七八个伙计，他们每天披星戴月干十一二个小时的活，早晚还得轮流给资本家看门、担水、扫地、做饭；到麦收时，还得到地里收庄稼。平时工人们稍有不

慎，就会遭到老板的拳打脚踢。资本家每天只让工人们吃四五两粮食的饭，三顿都是发了霉的老咸菜和掺着树叶、苔菜的窝窝头。耿长锁看到资本家对工人这样残酷剥削和欺压，恨得咬碎牙。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耿长锁愤愤地离开了董大车绳铺。

回家以后，耿长锁就以打绳为业养活父母。他整天没黑没白的纺经子、打麻绳，但一天挣的钱根本糊不了三个人的口，因此常常以野菜渡日。父亲那多病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撑了。这时候，耿长锁多么想让父亲吃一顿可口的饭啊！大年三十那天，街上忽然传来卖白面的叫声，耿长锁一狠心，抓起仅有的几个铜钱跑到卖白面的担子前，他刚刚伸手要买，父亲那蜡黄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今天用这钱买了白面，明后天吃什么呢？他来回转了三四圈，拿着钱的手都攥出汗来了，也没说出个“买”字来，只等到卖面的走了很远，他还在那里站着为难。

在旧社会那漫漫的黑夜里，五公村有多少人家和耿长锁有着同样的悲惨遭遇，过着同样辛酸的生活！仅仅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几年间，就有二十多户背井离乡，要饭逃荒闯关东；有十几户卖掉了亲生儿女。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糠菜树皮填肚皮，数九隆冬无棉衣，住着露天破坏房，卖儿卖女渡饥荒。”五公贫苦农民就是这样年复一年，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不屈的斗争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五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

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公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为争取解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林凤翔等人率领北伐军，在这一带人民的支援下，攻克晋州，深州，杀死清朝知州和州判，并准备攻打饶阳县城。一八六八年一月，捻军将领张宗禹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曾在这个地区大败清军，两次攻占饶阳县城，并进到距离五公村只有二十五里的留楚镇。大冯营村等地人民与捻军密切配合，把清政府派来的军队和地主武装杀的人仰马翻，“死有千余人”，击毙清军将领刘家兴、金成德。一九〇〇年，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这里的人民“纷纷竞起，与邻州县相应和”，他们“设坛传习”，“分立旗帜，千百为群”，“官不能制”。五公和邻村高桥、王桥、曹庄等地都有义和团活动，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五公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渡过了几十个年头，转眼间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血腥统治，五公村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了。李化岐、李化南一伙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贫苦农民也掀起了英勇的反抗斗争。

当时，在五公一带普遍流传着耿长锁反抗地主靳志昌的斗争事迹。

有一次，耿长锁在窦村庙会卖绳，大地主靳志昌拿了两挂绳扭头就走，耿长锁怒火冲天，他一把将绳夺了过来，说：“不给钱就不能拿绳，这你不懂吗？”靳志昌是此地一霸，从来白吃

白拿，这次被耿长锁刹了威风，怀恨在心。过了几天，他串通了几个地痞流氓，又来“买”绳，他们捏造绳子斤两不够，当众折了耿长锁的秤。这一下，更激起了耿长锁的满腔怒火，他一把揪住靳志昌的脖领，当众讲理，又到附近皮条铺借来秤，当众称绳，斤两足够。赶集的群众也愤怒了。他们蜂拥而上，将靳志昌一伙团团围住，予以痛斥。靳志昌一伙看到群众摩拳擦掌的样子，害怕吃亏，只好赔了秤，灰溜溜地滚走了。

到了年底，耿长锁一结账，发现靳志昌还欠三块一毛钱的绳费，他便来到靳家要钱。耿长锁还没走进大门，就见一个老人因为要工钱被赶了出来。耿长锁一听狗地主赖账，怒从心头起，他三步并作两步，一直闯了进去，只见一个穿长衫的管家对几个要工钱的穷人说：“今天没钱，过了年再来吧！”耿长锁打量了一下管家，指着他的鼻子说：“告诉你们东家，今天有钱也得还，没钱也得还。”管家推辞说：“东家不在，我作不了主。”耿长锁说：“你家东家不在，我们就等着，什么时候还账，我们什么时候走。”管家见耿长锁等人寸步不让，偷偷跑到后院把话告诉了靳志昌。靳志昌一听来人是在窦村集上揪他脖领子的耿长锁，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只得叫管家还账。耿长锁两斗“霸道王子”靳志昌的事在五公一带传开后，更增加了广大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的勇气。

一九三五年，李化岐迫害徐敦的罪行，激起了全村贫下中农的满腔怒火，新仇旧恨使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地主土豪的欺压和迫害。这时，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和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消息也传到五公一带；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

矛盾日益尖锐，全国人民在我党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高潮。这些消息鼓舞着五公村的贫下中农，他们逐渐仨一群俩一伙的在灯下、地头议论着：“地主老财有钱有势，我们不和他们斗争，连命都难保啊！”“不能这样任凭地主老财们欺压咱们，要和他们干！”“耿长锁能斗倒靳志昌，咱们抱了团，就不怕李化岐。”……五公的先进农民开始串连了，“组织起来跟地主斗争”的口号，从村东传到村西，从这户传到那户。多少年来贫苦农民对地主老财的仇恨象干柴烈火一样，逐渐燃烧起来了！

深秋的一天，五公村二百多户贫苦农民怀着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和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的决心，陆续集合在村西“观音堂”的大屋里，空旷的前殿挤得满满的。徐义洲等贫苦农民先后讲了话，他们以徐敦入狱的事例，揭露了地主阶级的豺狼本性，号召大家说：“只有穷人们联合起来，今后才不会出第二个徐敦。”到会的群众情绪激奋，人们前拥后挤，高举拳头，发出了一阵阵“团结起来同财主们干”的口号声。在这个会上，根据大家的一致要求，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联盟会。拟定了《联盟会宣言》，宣言中写道：“五公村受苦受难的穷人们为求生存，自愿联合起来，结成团体，同生死共患难。一人有事，大家上前，誓与财主作斗争。”从此以后，“联盟会”与地主、富农们断绝了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一切来往，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联盟会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力保徐敦出狱。联盟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到饶阳县城揭露了李化岐迫害徐敦的事实真象。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之下，国民党县政府害怕惹起广大

农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只得放出了徐敦。徐敦出狱时满身是伤，骨瘦如柴，但他同地主阶级斗争的意志更坚强了。回家后，他找到一把杀猪刀在石头上磨的哧哧直响，要和李化歧拼命。联盟会的其他贫苦农民也说：“干吧，你死了我们接着，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李化歧听到这事，吓得几天没敢出家门，托人把谷子如数送回，又摆了一桌酒席，认了罪。这次斗争的胜利，使五公村人民开始认识到贫苦农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

一九三六年秋天，日寇侵入华北，国民党军队大批南逃，到处抓伏派款，搅得民不聊生。一次，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逃到南韩村，以“修筑工事”为名，要各村派出大批民工。反动村长、地主李建亭找到全村贫苦农民说：“现在有一个挣大钱的差事，‘国军’为了防日本，在南韩村修工事，谁去，一天六角钱。”五公贫苦农民们以为这是为了抵抗日寇侵略，就答应了。他们每天带上几个糠窝窝没黑没白地干了半个多月才回村，谁知李建亭把脸一变，不给工钱了。他说：“民伕是上面派的，上面不给钱，我怎么办？谁想要钱，找‘国军’去。”一直赖到年底。

李建亭蛮横霸道，激起联盟会广大贫苦农民的无比愤怒。全村民工聚集到一起，冲进李家，齐向李建亭说：“你把民伕的工钱拖了好几个月，现在大伙都没吃的了，赶快算工钱！”李建亭看到贫苦农民声势浩大，不敢硬顶，就奸笑着说：“这个事这样办吧，民工的工钱，由联盟会和村里富户共同负担，你们联盟会拿出多少，我们就拿出多少。”原来，这个家伙早就打好了鬼主意，想拿穷人一把。他认为，联盟会都是一贫如洗的穷

苦人，根本拿不出钱来，这样办，不仅地富们不用出钱，而且可以打击联盟会的威信。但他没有想到，联盟会一口答应了。

民工们回来以后，联络全体贫苦农民，很快搞到一百元钱；地富们没办法，只好拿出一百元钱，二百元钱的绝大部分被联盟会的民工领走了。接着联盟会又把二百元凑了起来，拿出了一百五十元作为民工工钱，地富们只好又拿出一百五十元，绝大部分仍被联盟会的人领去。第三次，按照这个办法，联盟会又斗出地富们二百元钱。经过三次斗争，李建亭还欠着民工一半工钱，但他看到自己在斗争中一再失败，再不敢用这种办法与民工们为难了。

一九三六年的腊月三十，联盟会三百多人，又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地主老财们吃饺子，我们连稀粥都喝不上，找他们要工钱去！”“不拿钱装他的粮食！”愤怒的人群如同潮水一般向李建亭家涌去。李建亭看到怒气冲冲的人群，心惊胆战，两腿发抖，连连说：“大家先回去，咱们慢慢商量！”人们齐声喊道：“不听他那一套，不拿钱就动手！”李建亭在群众的威力面前，只得拿出了上千斤粮食，补齐了民工的全部工钱。这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

从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到联盟会同地主李化岐、李化南的斗争，五公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但是他们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党的领导，没有找到先进的理论做行动的指南，因而也就始终处于自发斗争的阶段，不可能彻底砸碎封建枷锁，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五公人民日夜盼望东方出红日，盼望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大伙闹翻身。

第二章 抗日烽火

发动群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军队，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入，仅三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河北省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并把其侵略魔爪伸向广大农村。一九三八年底，饶阳县沦陷。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紧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共冀中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

一九三八年春，冀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五公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政权，成立了工人抗日救国会（工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农会）、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游击小组和妇女自卫队等武装组织，积极开展了抗日活动。

五公村在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充满着夺

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敌人是不甘心自行退出舞台的，地主分子李化岐，妄图继续把持村政权，维护封建统治。他听说要建立农会，就串通了一伙地主富农，蒙蔽了一些群众，抢先组织了一个假农会，跑到区政府报了名。五公村贫苦农民到区里揭露了李化岐的阴谋，把政权和农会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五公村建立起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春，上级派饶阳县四小区区委书记靳清廉同志来到五公村。他到了五公村，首先找到了联盟会的骨干分子给他们讲了抗日形势，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怎样发动群众抗日等，使他们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他们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他们更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斗争。以后靳清廉又给他们讲了党的性质和任务，他严肃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组成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农民阶级闹翻身，求解放。”“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在陕北的延安，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将来还要解放全国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呢。”听了这番话，徐义洲等人心里更加豁亮起来，紧紧握住靳清廉的手，激动地表示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并提出了参加党组织的要求。在斗争的考验中，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徐义洲等三人在火红的党旗面前庄严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了五公村党支部。由于当时斗争情况复杂，党支部没有公开。

五公党支部建立以后，五公村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起来。五公党支部领导五公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抗日

政策,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发展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党颁布了合理负担政策。五公村农民组成了查田小组,对全村土地进行了检查,根据土质好坏,水肥的条件,评定了产量,确定凡能产一石粮食的土地为一个“标准亩(富力)”,每个人除去一个半“富力”的“免征点”,按土地多少分别交纳公粮和抗日费用。这样一来,废除了过去有地就得纳粮的旧制度,大大减轻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地主李建亭公开跳出来反对说:“你们这些穷光蛋,每人还不到一亩地,就想免一个半富力”,并且抗交公粮。工会改善部长耿长锁同志一听非常气愤,他带领穷哥们,同李建亭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李建亭交足了公粮。经过这场斗争,群众的腰杆更硬了,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使合理负担在五公顺利实行了。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发表了《论政策》这篇光辉著作,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上级党委派来工作组,帮助五公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增资保佃运动。工作组一进村,首先召集长工和佃户们开会,揭露批判了地主富农的剥削罪行,号召大家起来同地主富农算剥削账,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长工们迫使地主富农给他们增资增粮,实行了“半实物半工资制”。贫苦农民的腰板挺得更硬了,抗日积极性更高了,地主富农的“威风”受到了沉重打击。一九四四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五公又开展查减斗争,使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取得了的更大胜利。

与此同时，五公村在实行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即把“免征点”以外的“富力”递增累进，一个富力拿一斗公粮，两个“富力”拿二点二斗公粮，依此类推，“富力”越多负担越重。在这种情况下，狡猾的地主富农采取了种种卑鄙的手法，逃避负担。李建亭写假地契，窝藏黑地，富农李端府把地贱价卖出租出。一个一贯破坏抗日工作的富农李老春，偷偷把地写在几个贫农名下。针对这种情况，五公村党支部一方面作出规定，凡向外出租、典当土地的，期限必须在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对逃避负担的地主、富农开展了斗争。

一天，耿长锁把李老春找到工会，问道：“你为什么不拿负担？”李老春说：“我的地都卖了。”“卖给谁了？”李老春吱吱唔唔说出了几个贫农的名字。耿长锁立刻把这几个贫农找来，叫李老春当场写了文书，说：“这土地永远属贫农了！”李老春只好当场认罪。从此，五公村的地主、富农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统一累进税政策了。

通过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等政策，五公村贫苦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土地，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抗日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先后把自己八十多名优秀子弟送到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那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五公村就沸腾了。八路军、游击小组和妇女自卫队在地上练武；青年干部训练班、农民学校、妇女识字班在大庙里上课宣传抗日思想；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前进，中国的青年”，“叫老乡，快去上战场”的歌声和送公粮的大车声，操练

场上的军号声、口号声、跑步声、农民劳动时的水车声交织在一起，震动着整个原野，全村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摆开火阵烧野牛

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发表了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毛主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论持久战》很快传到了五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五公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日寇占领饶阳县城以后，由于八路军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机关经常在五公一带活动，因此日寇对五公附近进行骚扰，而且不断偷袭五公，搜捕抗日干部。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五公村党支部在村里建立了二十多个堡垒户，同时成立了假“维持会”，每天以“送情报”为名到各据点里侦察敌人活动情况。这样，五公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堡垒村，冀中区许多抗日干部和八路军的伤病员都来五公隐蔽和疗养。全村群众把他们看作是家里人，亲如父子兄弟，为伤病员烧水做饭，消毒换药，有了敌情就把伤病员转移出去或隐蔽起来。在五公抗日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八路军伤病员一批批恢复健康，重返前线，痛杀日本侵略者。

为了配合八路军作战，箝制敌人，五公村民兵还展开了交通斗争。

沧石公路是冀中平原的一条交通要道，日寇每天都要通过这条公路运送军队和军火，运走抢掠的物资。为了更有利侵略战争，日寇还妄图把沧石公路改造为沧石铁路。冀中军民看到敌人这样疯狂，心里非常气愤，积极开展交通战。那时候，五公抗日群众经常在夜里来到沧石路，游击小组放哨警戒，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挖的挖，刨的刨，第二天沧石路上就出现了许多大坑大沟，使汽车无法通过，有力地破坏了敌人的运输，限制了敌人的活动，并粉碎了敌人修通沧石铁路的计划。

除了破坏沧石路以外，民兵们在五公村周围也进行交通斗争，为了防备敌人偷袭，他们把村周围的公路、大车道都挖成深四、五尺宽五、六尺的隐蔽交通道，只能走大车不能走汽车、坦克，把挖出的土堆在道沟两旁筑成上墙，构成密如蛛网的深沟和高墙。他们还把村头大小街口都堵了起来，在距村不远的地方，用铁丝拴上铃铛，晚上派人看守。这样，使得敌人进村后出门是沟，迈步是壕，找不到道路，找不到街口，大大削弱了敌人快速部队的战斗力，而乡亲们和八路军活动起来则又迅速又隐蔽。

在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中，五公村民兵还经常外出，以高度分散的麻雀战袭击和困扰敌人。他们有时晚上行进到鬼子附近，四面鸣枪，高声呐喊，敌人不知真实情况，不敢外出，只得躲在乌龟壳里四面扫射，消耗了敌人大批子弹。五公民兵们还常常趁夜割取敌人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打埋伏，抓汉奸，堵塞了敌人的耳目，保护了群众安全。

一九四〇年，五公村游击小组有了很大的发展，游击战打法也越来越多了。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党支部派游击组

李健同志到县里去学习爆破技术。他回来以后担任了爆破小组长,带领民兵们在村口、公路、敌人炮楼旁边埋上地雷。埋雷的花样也很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今天这里埋,明天那里埋,有效地发挥了地雷的威力,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由于利用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斗争,五公周围的敌人受到了严重打击。在党的领导下,五公和冀中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使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一年后,抗日战争进入了困难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反人民活动,日寇也大大增加了对付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兵力。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寇集中五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野蛮的大“扫荡”。

阴历三月二十八,冀中区八路军十八团一个连,在五公村西英勇阻击日寇,掩护全村群众转移,战士们个个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歼灭大量敌军,在胜利完成任务以后,主动撤离。日寇进村以后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毁房屋一百一十多间,抓走青年二十多人,一位老人因病无法转移,被日寇残杀,日本鬼子抢走大量牲口、粮食、家俱和财物。

大“扫荡”以后,五公一带变成了敌占区,日寇在五公周围的沃堤、北韩村、杨各庄、屯里、西沿湾等六个村安上炮楼,各据点的鬼子汉奸经常来五公烧杀掠夺,征粮抓伏,敲诈勒索。日寇向每个“富力”征粮二十五斤,征款二百元(折粮七十多斤),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当时五公一带,真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在日寇的摧残下,生机勃勃的抗日根据地,变成了疮痍满目、田园荒芜的一片焦土。但是,五公人民并没有屈服,抗日的烽火在继续燃

烧着。

一天，天刚蒙蒙亮，一百多个日本鬼子和伪军偷偷包围了五公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南李家祠堂房后空场里。四周，瞪着充满血丝眼睛的日伪军，像吃人的野兽一样，端着刺刀，前后分站两排，逼着人们交出共产党、八路军来，但五公抗日群众没有一个人回答。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拿起碗口粗的木杠在人群中乱打，几十个群众被打得遍体鳞伤，即使这样，在场的二百多群众也没有一个屈服的。日本鬼子无可奈何，烧了二十多间房子后滚回去了。

不久鬼子又来“扫荡”。群众闻讯后，都隐蔽到青纱帐里，鬼子在村里找不到人，放火烧了八十多间房子。在回据点的路上，敌人发现村西坟地里有一个人，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当场打死抗日群众三人，打伤十人。就在日本鬼子天天清乡扫荡，烧杀抢掠，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生活的战争年代，五公村地主富农又趁机增租加利，残酷地剥削广大贫苦农民。但是，在斗争条件极端残酷的情况下，阶级仇、民族恨使五公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坚强。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乡亲的尸体，更加机智顽强地坚持了抗日斗争，到处给予日寇严重的打击。

“五一大扫荡”后，不久就到了秋收时节，青纱帐割倒了。没有高山大岭和树林的五公一带，对坚持抗战产生了更大困难，游击小组、抗日干部和群众的活动，受到敌人的“清乡”、“扫荡”的严重威胁。五公人民遵照毛主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号召下，创造了利于隐蔽便于斗争的地道战。

五公村的地道，早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开始有了，但那

时沒有形成全村的地道网，设施也不够完善。一九四二年冬天，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游击小组的掩护下，五公广大群众掀起了一个挖地道的热潮。白天，他们除了躲避敌人的“扫荡”以外，还要搞生产。天一黑，游击小组就到村头放哨，群众开始挖地道。为了隐蔽，他们巧妙地把洞口挖在灶下，炕席下，井里以及墙里，还在树下和墙角下挖了气孔，让新鲜的空气流通到地道里。为了防水，他们还把地道挖成两层，如果敌人放水，水就从底层流回水井。还有的地方挖得很小，只能过一个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只要有一个人，就能消灭钻洞的敌人。如果敌人放毒，只用两锹土就能堵上。经过群众的努力，五公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挖成了四条地道干线，全长六千五百米，达到户户相通，村村相连。地道战的开展，坚定和鼓舞了五公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保证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安全，使得鬼子的“扫荡”常常扑空，而八路军和游击小组却能灵活打击敌人。在五公人民反“扫荡”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群众，保卫抗日干部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人们讴歌传颂。

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屯里岗楼的鬼子突然扑到五公村，把村东南角的房子团团围住，找洞抓人。这天，耿长锁和乔文章正在家纺经子，转移不及，被敌人抓住，押到了刘兰相大院里。他俩看到敌人正在拷打刘兰相的母亲和侄子。原来鬼子在这里发现了洞口和气眼。鬼子把刘兰相母亲和侄子打得死去活来，逼着他们说出洞是谁挖的，哪里还有洞，但刘兰相母亲和侄子咬紧牙关，只字不吐。鬼子气急败坏，想用火烧他们，就搬来两捆秫秸，然后摸摸口袋，窜到屋里

去了。看到这些情况，耿长锁想，鬼子一定是找火柴去了，我绝不能让他们的毒计得逞，便机智地把秫秸扔到了墙外。过了一会，鬼子出来发现秫秸没有了，立即象饿狼一样扑了上来，伸手向耿长锁打去。长锁一低头，鬼子打了个空，气得哇啦哇啦直叫，立即用刺刀逼住了耿长锁和乔文章。

鬼子见乔文章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先在他身上下了手。一个鬼子拿根大柳木棒子，“吭哧”一下把乔文章打翻在地；另一个鬼子又上前来，把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文章身上，用刺刀对准了文章的脖子，要他说出洞是谁挖的。耿长锁看到这种情况，为了掩护乡亲，从容地搭了话：“地道是八路军挖的，老百姓不知道。”

耿长锁一开口，鬼子的注意力立刻转移过来。一个鬼子上来，先是一杠子，接着又踢了一脚，长锁往旁一闪，杠子打在地上，脚也没有踢着。恼羞成怒的鬼子，气势汹汹地把北屋前的一把大铡刀搬了过来，唰的一下掀开铡刀，将长锁的头按在铡刀口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你的说，洞的谁挖的？不说，死了死了的有。”几个汉奸也凑上来说：“还不快说，不然刀一放，你就上西天了。”

面对敌人的淫威，耿长锁心潮翻腾，他想起了穷苦人苦如江河仇如海的悲惨遭遇，想起了共产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想起了八路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顿时觉得自己如钢似铁，浑身是力，决心为抗战事业，为穷苦人的解放献出自己的一切。耿长锁用两只喷射着仇恨火焰的眼睛瞅了鬼子一下，面不改色，声不变音，大声地说：“你们铡了我，我也不知道！”面对这个威武不屈的钢铁汉，鬼子不知所措，

只得嗷嗷地乱叫。正在这危急时刻，游击小组打了过来，枪声、口哨声在街上象爆豆似的响了起来，鬼子汉奸心一慌，扔下了耿长锁，仓皇逃跑了。

耿长锁对敌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五公人民坚持抗战做出了榜样。

过了不久，日本鬼子又一次袭击五公村。爆破组长李健在带领民兵掩护乡亲们转移时，不幸被敌人抓住了，鬼子把他押回村里进行严刑拷打，压杠子，灌辣椒水……，逼问他：“共产党员和干部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地道洞口在哪里？”李健同志咬紧牙关，只用“不知道”三个字回答敌人。敌人看着拿他没有办法，就把他拴在马上，拉着他在街上走。李健趁敌人不备，挣脱绳索就跑。刚受过毒打的李健，两条腿负了伤，跑起来非常吃力，敌人又骑马追了上来，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了，就横下一条心：宁愿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于是，他一头栽进附近一口井中。可是，井水很浅，李健又被两个鬼子捞了上来继续折磨。鬼子累得精疲力尽，还是没有问出结果，最后凶残的敌人就把李健扔进火堆里。敌人走后，乡亲们含着悲愤的眼泪把李健从火中抢救出来。李健醒来后，望着周围的乡亲们，拉着支部书记的手，坚定地说：“一定要坚持下去，战斗到最后胜利。”几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李健同志牺牲了。他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全村人民和日本鬼子进行更顽强的斗争。

“五一一大扫荡”以后，共产党员乔恒泰担任了抗联主任，他家经常住着区、县直到小区的各级干部。一九四三年的一天，乔恒泰家住上了冀中区工会的几个同志。晚上，为了保证同

志们的安全，乔恒泰没有睡觉，在门外放哨。忽然他听到街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就发现一伙人影移动过来。乔恒泰警惕地问：“什么人？”原来是叛徒何会海带着敌人包围了五公村。何会海原是县大队队员，对五公村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一听说乔恒泰，便开枪将乔恒泰同志打伤了，乔恒泰忍着剧疼，正要还击，被几个冲上来的鬼子抓住了。

敌人为了找出村里的抗日组织和隐蔽的干部，对乔恒泰连夜进行审问。敌人把乔恒泰打得昏死过去，再打强心针，逼他交出八路军的干部来。但乔恒泰宁死不屈，直到牺牲也没暴露秘密。

天亮以后，敌人又把全村老百姓赶到现场，让人们认尸，企图再找到点线索。当乔恒泰的母亲发现躺在地上的那个遍体鳞伤的死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时，心如刀绞一样难受。但是，为了保护亲人，她忍住了眼泪。一个鬼子问她：“老太婆，这个人你的认识？”她十分沉着地说：“我不认识他，不知他是谁。”乔恒泰同志和他的母亲，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耿长锁、李健、乔恒泰等同志英勇事迹鼓舞下，五公抗日烈火越烧越旺，游击小组的同志们，对敌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战术越来越灵活，其中最为出色的，是除奸斗争。

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汉奸来到五公，勒索了一些钱财后就准备返回据点。到了半路，这个家伙觉得不满足，又转了回来，用枪逼着“维持会”要钱，要东西。“维持会”的人一面支应，一面派人报告了游击小组。游击小组的几个同志冲进维持会，那个家伙见势不妙，抽出枪来还想反抗，民兵们一拥而上，将他抓住，押到村东处决了。这个时候五公一

带还有几个汉奸经常伪装成八路军和县大队，四出活动，抢掠财物，挑拨我军民关系，各村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一天晚上，五公游击小组的几个同志，配合区小队，把他们抓住，枪毙了三个罪大恶极的敌人，对其余的进行教育，然后宽大释放。

除了消灭外出的零星日伪军外，游击小组还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消灭敌人。一九四三年春的一个晚上，耿铁相同志带着几个同志来到小堤楼附近，通过“关系”，机智地把罪大恶极的伪军小队长邹连山“请”了出来。这个家伙一出炮楼，就被民兵两枪打倒在地。第二天，炮楼里的“关系”又送来信说邹连山没有被打死，今天上午用担架送往饶阳医院。同志们接到信后，到公路上埋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副担架慢悠悠地过来了，耿铁相等人冲了上去，掀开被子说道：“狗汉奸，你的末日到了！”“砰”的一枪，结果了邹连山的狗命。

游击小组力量壮大后，还配合八路军成批地消灭了敌人。一九四三年冬的一个上午，区小队来到五公村东头。下午，一个鬼子小队长带着一伙敌人来到五公村，挨家搜查。一个鬼子刚进区小队住的院，就被岗哨开枪击毙，其余的鬼子吓得扔了枪就往村南跑，区小队和游击小组同志追了出去，一阵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把这伙鬼子一个不剩地消灭了。

这次战斗后不久，日寇为了报复，集中不少兵力，妄图偷袭五公。抗日军民得到情报以后，将计就计，在村南设下了埋伏。鬼子刚一露头，只听八路军指挥员一声喊“打！”手榴弹、地雷立即在敌人群中炸开来，密集的子弹象暴雨般地射向敌人。日本鬼子连续发动几次进攻，然而除了在阵地前面留下一大片死尸外，什么也没捞着。最后狼狈地逃回了据点。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从一九四四年起，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转入反攻。五公人民配合八路军，开始了解放饶阳县的战斗。敌人的碉堡，坐上了土飞机，敌人的政权组织，到处被摧毁，一九四四年春，西沿、沃堤、杨各庄、小堤的鬼子岗楼先后被铲除。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被日寇占领七年的饶阳城解放了，从此，饶阳县全境变成了解放区。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正式向中国人民投降，五公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第三章 组织起来

“土地合伙组”的诞生

“五一大扫荡”以后，冀中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摧残。青年大批被屠杀和被征服苦役，牲畜、农具被敌人抢掠一空。一九四三年五公一带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先是大旱，从春天到二伏，没下一场透雨，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虽然二伏以后下了几场雨，但由于缺乏种籽，人们又想着收点实在粮食，就没有种荞麦、萝卜，而种了很多晚玉米，谁知玉米刚刚结粒，就被寒露以后不几天的一场寒霜打死。这一年，全村几乎没有什么收成。

在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情况下，谁能经受住这一场又一场敌祸天灾的严重打击呢？当时在五公，糠麸、花生皮、山药蔓、榆叶、秫秸杆、荞麦秕子成了贫下中农的主食，野菜吃净了，榆树皮剥光了，甜棒根（草根）一斤就要边币三元。五公的人民，有的由于食不果腹，瘦的皮包骨；有的食物中毒，全身浮肿。据不完全统计，从“五一大扫荡”到一九四四年春天，仅有三百三十四户的五公村，就有一〇一户卖地，十三户卖房基，二一三户卖家俱、衣服，二十九户卖儿卖女，五十五户打发了闺女，十三户外出逃荒，十二人串村讨饭，另外还有十五人饿死，五十七人饿病，四人饿疯。耿长锁卖光了家产，全家只剩

下一床破棉花套，还是没饭吃，一次刚刚下炕就饿昏了过去。为了生活，他三斗高粱打发了大闺女；老伴徐树宽背了儿子，抱着不满周岁的闺女到北乡里要饭、拾柴，小女儿饿昏在地里。贫农卢墨林的老伴带着小女儿到滹沱河北拾麦子，连饿带昏倒在半道，刚刚抬回家就断了气。中农乔万象也只能靠低价卖檩条和衣服勉强渡日。

正当五公人民极端困难的时候，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同月作了《论合作社》的讲演。十一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又发表了《组织起来》这篇光辉著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主席号召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都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广泛地组织起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全国、为五公贫苦农民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一九四三年，中共饶阳县县委先后向党员、干部传达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组织起来》等重要文献，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向全县人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生产渡荒”的号召，饶阳县县委还派人到五公帮助建立了旨在反对日寇掠夺政策的“对敌斗争隐蔽经济组”。“隐经组”发动群众，成立了打绳、织

布、轧花、磨面、小油坊、木场等八个副业组。他们自力更生，渡过了灾年的冬天。

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天，个体经营的农业和集体经营的副业发生了矛盾，五公村的八个副业组散了七个，只有一个打绳组在“隐经组”的耿秀峰的帮助下，转成了四户的“土地合伙组”。耿长锁参加了土地组，并担任组长，不久，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组的其它成员是：共产党员乔万象和贫农卢墨林、李砚田。

在成立土地合伙组的会议上，耿秀峰帮助起草了《土地合伙组章程》，《章程》一开头就说：“为了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大家有饭吃，有活作，孩子有书念，我们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自愿成立土地合伙组”，简单、明了地阐明了成立土地合伙组的宗旨。《章程》规定，在保持私有权的基础上，把各户土地、资金合伙使用，在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十作为公积金，农业收获按劳力，土地对半分配。副业所得按劳力六成资金四成分配。这个土地合伙组的性质，大体类似以后的初级社，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副业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早在民主革命的艰苦战争年代，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五公村四户贫苦农民就办起了这样一种具有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经济组织，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可贵的试验。

土地合伙组刚刚诞生，就受到了党的亲切关怀。冀中根据地党委和抗日政权，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努力扶植这个新事物。饶阳县抗日政府负责人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高兴，他说：“土地合伙组是在土地私有之上，群众自愿互利原则之下进行土地合伙、集体劳动的，这个路子比较稳妥，很有希望。”

这位负责人还指示五公抗日政权，要随时帮助解决土地组的困难。不久，区抗联把五百元边币的机关生产费投到土地组。地委书记专门派人了解土地组的情况和经验。区委书记靳树芳给土地组送来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组织起来》，并把八路军拆小堤鬼子据点的砖拨给土地组三千块，让他们垒个大猪圈。《冀中导报》报道了土地组的情况，县大队又把从日寇手中缴获的一头小黑骡交给土地组喂养和使用。党的阳光雨露，照亮了土地合伙组前进的方向，滋润着土地合伙组茁壮成长。

在斗争中成长

土地合伙组的诞生，是五公村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开始。因此，在土地组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在耿长锁同志的带领下，五公四户贫苦农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思想斗，七斗八斗，斗垮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斗出了土地组的发展。

土地合伙组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在五公村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各个阶级对土地组作了不同的评价。地主李茂修凭着自己的阶级敏感，意识到这是捅往自己心窝上的一把刀子。他恶毒攻击说：“穷人耍都成了土地组，那谁还扛活打短呢？我上哪雇人呢？这还有穷有富吗？没有穷富，还算什么世界？真是穷极生疯。”富裕中农李亨通也讽刺土地组是“穷光棍对穷棒槌”。他还说：“一家子过日子还免不了马勺碰锅沿呢！土地组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面对这种种攻击和非议，土地合伙组认真学习了《组织起来》，耿长锁鼓励大家说：“我们人虽穷，但

有一身穷志气，一身硬骨头，我们就是要靠大伙的力量，富裕起来。”他带领土地合伙组，打退了地主阶级的进攻，顶住了富裕中农的嘲笑。

一九四三年秋天成立的打绳组里，还有一个中农，他的土地比其他几户都多，生产条件也好些。当打绳组转成土地组时，他一想：自己的地里打下粮食要被劳力分去一半，太吃亏，就找到乔万象说：“我的地多，你们地少，合在一起种，我不干。”乔万象对他说：“原来咱们一块干得挺好的，还是一块干吧，你要认为吃亏，咱们就把章程改改，不然，组里替你拿公粮也行。”但是，这个中农最后还是坚持退了出去；他的退组，并没有动摇其它几户农民组织起来的决心。他们表示，坚决把土地合伙组办好，引导全村群众都走上组织起来的金光大道。

土地合伙组建立时，的确是“穷光棍对穷棒槌”。他们没有牲口，缺少土地和农具，春耕开始了，土地合伙组没有牲口，没有犁耙，无法耕地。怎么办？土地组的贫苦农民找出了三把旧镢，打一打，磨一磨，就下了地。经过几年战火和灾荒袭击，土地硬得像块石板，加上肚里没食，他们没刨几下，就出了一身虚汗。头半天，几个人只刨了二三分地。但他们没有叫困难吓倒，下午揣了几个菜窝窝又下了地。刨啊，刨啊，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人。你累了，我接着干，我累了，他又接过去，人停镢不停。他们手上磨起了血泡，衣服没透汗水，终于把十二亩地翻了一遍，把种子播下了。许多贫苦农民看到这种情况，都赞扬说：“还是团结力量大呀，到秋后咱们也参加土地组。”他们还学着土地合伙组，刨地播种。就这样，土地合伙组不仅为五公村春耕闯出一条新路，而且带动了几个邻村的春耕生产。

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后就被形象地誉为“三把大镢闹革命”的精神。

一九四四年麦收到了。这一年全村庄稼长得都很好，土地合伙组的二十几亩长得尤其喜人，最大的麦穗达到了八十多粒。日本鬼子看着翻滚的麦浪，打起“以战养战”的鬼算盘，紧着分发镰刀，征集火车，准备出城抢粮。中共饶阳县委和县抗日政府发号召：“快打、快收、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食”。五公村党支部也组织了“麦收委员会”，下设宣传、护麦、组织三个股，动员组织群众抢收粮食。

耿长锁听到上级指示以后，马上召集土地组开了动员会。这几个月来，由于把争取抗战胜利与过共同富裕日子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土地组挖地道，破公路，为军属代耕，事事都走在前边。这一次，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耿长锁在会上说：“咱们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了，眼下，上级号召抢收麦子，咱可还得走在前头。”组员们也纷纷表示：“咱豁出命也得挑头干。”在土地合伙组的影响下，五公一下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社二十二个，参加户数达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根据自愿互助的原则，统一调配和使用劳动力。在八路军的掩护下，全村群众晚上集体护麦，白天收割扛打，干得热火朝天。全村仅用七天时间，胜利完成了麦收任务，干脆利落地粉碎了敌人抢麦阴谋。这次麦收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对五公全村群众来说，是一次集体主义教育，是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大演习。

毛主席在谈到变工队一类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时曾指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

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土地合伙组成立后，不仅初步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面貌，而且也初步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首先是人与人之间，过去的各自孤立、个体生产的关系变成了友谊互助大家富裕的关系。在耿长锁的带领下，“老四户”干活时你争我抢，分粮时互相推让，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一样。那时候，土地合伙组虽然还没有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但耿长锁坚持民主办组的原则，有事就和大伙一起商量，依靠集体的智慧解决问题，把组办得生气勃勃。耿长锁遵照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中关于“**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的指示，发动“老四户”家庭中的妇女冲破了封建意识束缚，下地劳动，并帮助解决了卢墨林公媳之间的矛盾。耿长锁还帮助大家克服了旧社会遗留给自己的不良习惯。土地组在耿长锁带领下，不仅开始迈出了同旧的生产关系决裂的第一步，而且迈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第一步。

一九四四年麦收以后，由于集市上对烟绳需求量非常大，土地合伙组的活更加忙了。他们把赶集挑烟绳的担子换成了小推车，每次集都卖三四百斤，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买烟绳的人很早就到集上来等着，土地合伙组的小车一到，总是嗡的一下就把绳抢光了。不少烟农看着这情景心里都揣测着：绳不知道要涨多少钱哩。烟绳涨不涨价？耿长锁考虑了这个问题，涨价，绳是一样能卖出去，可以赚到不少钱，但这是小集体发家的邪路；稳住绳价，表面上土地组少赚一些，但实际上

是支持了烟农生产，支援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抗日战争。耿长锁还想到了不久以前自己入党时下的决心：要让土地合伙组这颗共产主义的根子扎得深深的，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他对大伙说：“全国贫苦农民是一家，土地合伙组绝不能像旧商人那样，恨人不死，恨己不富。”大家听了耿长锁的话一致决定：多打多卖，保持烟绳原有价格。土地组的风格，受到了烟农们的好评：“嘿！还是土地合伙组好！”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土地合伙组的集体经济开始壮大了。他们养了羊，打的绳也越来越多，在一九四四年农业副业都是大丰收。秋收粮食平均亩产二百二十多斤，花生亩产四百六十多斤，达到本村一般中农的丰产水平。打绳副业一结算，除去各户平时借支渡荒，各家仍有余钱，农业副业结合起来，土地合伙组各户收入超过了一般中农。而退组的那个中农，由于人力单薄，无法渡过荒年，几个月就卖了三亩地和一副车脚，还是没有饭吃，最后老婆带着孩子外出要饭，改嫁给别人。

列宁曾经说过：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都是求实的人。五公村的贫苦农民从鲜明的对比中，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优越性。没等秋收完毕，就有不少贫苦农民要求入组。耿长锁和党支部研究了一下，决定秋后吸收一批新组员，土地合伙组由原来的四户二十二户，发展到十七户八十八人，其中有贫农六户，下中农五户，中农四户，上中农二户。

一九四四年旧历九月的一天，参加土地合伙组的十七户农民开了会。耿长锁根据党支部的意见，发动大家共同修订

《土地合伙组章程》。大伙把土地合伙组改名为农业合伙组，同时，作了一些新规定：（一）增加了分红中劳动所得的比例。根据冀中行署八专署财政科一个干部的建议，农业合伙组把农业分红从原来的地劳平分改为地四劳六，把副业分红从资四劳六改为资三劳七，农具由组借用，坏了由组修理，不给租赁费。（二）增加了公共福利。《章程》规定：农业合伙组组员，因公致伤，医药费全部由组负担，休息期间照常记工。因公死亡，由组埋葬，照常记工三年，如家中没有劳力，可长期记工，直至后辈有劳动能力时为止。“抗勤同样记工”。（三）坚持民主办组的原则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章程》规定：农业合伙组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家庭代表会议，干部在每年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进行三次改选。不久，合伙组规定，全组每月开一次会，讨论合伙组的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新规定，使农业合伙组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农业合伙组的带动下，一九四四年冬天，五公又新建了两个土地组，共有十四户，章程完全按农业合伙组的办。另外，全村还成立了油坊、磨面、蒸包子、轧花、做豆腐、运输等副业组十九个，八十七户，妇女做鞋组十五个，一百二十户。这几种互助合作组织算在一起，占到全村总户数百分之六十四强。五公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出现了新热潮。

退组风波

农业合伙组成立后，组内土地增加到二百二十八亩，内有十亩菜园子，有三辆大车，几头牲口，同时开设了打绳、木场，

磨香油、做豆腐等副业，生产条件比以前大大改善了。组大人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一九四四年冬天，农业组副业生产一片热气腾腾。三个大骡子拉到一个槽上喂养，几个人铡草挑草；打绳组十几辆纺车纺经子，三盘绳车，要赶好几个集；木场设在大路北边，一大车一大车的树枝往里拉，铧凿斧锯，叮咣直响；磨香油，做豆腐的走街串巷。全组仅靠一冬副业生产，就添了一头骡子，两头驴，一头牛，解决了春耕畜力问题。饶阳县抗日政府在五公召开了全县生产大会，推广了农业合伙组的经验。

一九四五年春天来到了。为了在副业方面增加一些收入，扩大积累，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农业合伙组在农业上主要安排了一些妇女和青年，由庄稼能手张近仁带着干。这些人，技术不够熟练。李亨通见了就奚落说：“花果山的老猴王带了一帮小猴子下山了，土地组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李亨通的地与农业合伙组的地连在一起，他总想在全村群众面前把农业合伙组压倒，为此，他起早睡晚，加倍地努力把地种好。耿长锁知道这事后找到张近仁，说：“这场竞赛中，咱农业合伙组决不能落在单干户后面，要为组织起来争口气！”张近仁也早就下了决心，他认真向新手们传授农业技术，带领大伙精心管理，把各样农活都干得非常细致、周到。李亨通虽然有技术，但无奈地多劳力少，由于求快，地就锄得浅，不少小苗周围的土没锄着。在合伙组与李亨通的第一场竞赛中，就在精耕细作方面取得了胜利。村里人知道这件事，进一步体会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农业合伙组的成员干劲也更高了。

但是，在“农业合伙组”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五公村围绕

着要不要组织起来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了。

地主李茂修，眼看着农业合伙组天天发展，广大贫苦农民一步步摆脱了封建枷锁，恨得咬牙切齿，他对一些地多的中农户不断造谣说：“地四劳六，我看这是啃你的骨头哩。”李亨通也在村里散布流言蜚语说：“土地组是十八家王子坑人组。”本来一些生产条件好的中农参加农业合伙组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捞一把。另一些中农和农业组也不完全是一条心，而是带着试试看的态度入组的，他们听了李茂修的煽动及李亨通的谣言之后，对组织起来的道路发生了怀疑。

另外，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压迫逐渐解除了，封建势力进一步削弱了，根据地内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抬头。五公村有二个土地组，十九个副业组和十五个做鞋组，都没等到秋天就散了伙，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助长了农业合伙组里一些私有观念比较严重的人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早在成立农业合伙组的会上，一个有木匠手艺的人就主张自己比别人多记一些工。成组后，又有一些人干活儿时互相看不起，往组里投资时只是一星半点的应付差事，还有个别干部，常以有事为名，不愿参加劳动。组里开了齐心会，互相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还是没有挖掉这些人私有观念的老根。开春后，组里有个别组员，不经组长同意，就把集体的粪往自己地里拉；有的家里男劳力多的组员，为了自己秋后多分点，就把下地干活儿的妇女赶回家去；还有个别组员，主张开个小烧锅卖酒赚钱，有的就干脆装病不来组里上工，私自跑到别庄去当酒把式。耿长锁同志对组里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三番五次，

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帮助教育，热情地向他们宣传了毛主席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思想，谁知极少数人，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说什么“谁想入了组，倒叫人管起来了，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入哩！”

同时，农业合伙组改变分红办法时也因没有经验，做得比较简单，没有仔细考虑对一些缺少劳力的中农和抗属应给适当照顾，简单地套用了根据地对地富减租办法，又没有向地多的中农户进行认真解释，这就造成了一些地多劳力少的户的不满。

一九四五年秋天，庄稼还没收上来，就有八户要求退组。耿长锁马上找党支部进行了汇报，支部研究以后决定：对想要退组的要多作工作，实在不行，也要按照入组自愿、退组自由的政策办，用以后的事实教育他们。耿长锁按照支部的意见，找到要求退组的户，组织他们学习《组织起来》，算细帐，算远帐，坚决揭露敌人的阴谋，带领大伙把组坚持到了秋收以后。

秋收以后，有几户中农仍然要求退组。对于他们，农业合伙组中不少坚定的贫雇农是非常不满的，他们主张按照《章程》规定，不分给他们公积金和草，但耿长锁并没有这样作。他和乔万象、耿秀峰商量了以后，召开了全组会。耿长锁说：“咱们组织起来，是听毛主席的话，发展生产，叫大家都过好日子。今年农业、副业分的都比去年多，就证明这条道路走对了。现在，有人要退组，咱们一是劝他们好好算算帐看看到底是组织起来还是单干有优越性，二是不愿留咱也不勉强。最后，既然有不少退组户，咱就把公积金和草都分了，今后如看组好，还愿入，咱们欢迎。”在分公积金时，农业合伙组主动把大家都愿

要的麻、棕条分给了退组户，使他们受到教育。

农业合伙组退了八户，还有九户四十二人，一一〇亩地。从表面上看，人少了，力量弱了，但从实际上看，这次退组事件为农业合伙组以后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几天以后，耿长锁召集大家开了会，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阶级根源找了散组的原因，大伙决定：今后组的发展，一是要注意阶级路线，多收贫农户。二是要扎实，有了经验再迈大步。大伙还决定，今后要注意发动妇女出工，使一些男劳力少的户也能增加收入。为了带动中农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农业合伙组以退为进，把分红制改了一下：农业方面从地四劳六改为地六劳四；副业方面从资三劳七改为资四劳六，把妇女工从五成提高到八成。最后大伙讨论了农业合伙组的冬季副业生产问题。经过退组风波，有的组员看到钱、麻都叫人家弄走了，漏了气。耿长锁鼓励大家说：“他们退了组，剩下咱们，我看人心更齐了，人心齐，泰山移。”老贫农张近仁主动提出把刚卖木头的一万元借给组里，耿长锁又带着大伙凑了些钱，解决了打绳资金。为了帮助合伙组渡过困难，耿长锁、乔万象等村干部主动提出取消干部外出补助工分。这个会后，农业合伙组又搞起了打绳、作蜡两项副业，到了年底，收入边币三万元。

“咱们坚决不散”

毛主席曾经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一九四六年春天，经过退组风波考验的农业合伙组，又迎来了新的斗争。这年春天，饶阳县召开了群英大会。耿长锁代表农业合伙组出席了大会，在会上他介绍了合伙组

的发展情况和经验。许多代表都表示要向耿长锁组学习，但县里个别领导却大泼冷水。不久，冀中行署八专署实业科召开各县供销合作会筹委会干部会，耿秀峰介绍了农业合伙组的经验后，又有少数人攻击合伙组。他们根本不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及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看不到土地合伙组走的道路正是以后全国五亿农民必须要走的道路，而是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和革命新生事物。实业科一个干部说：“现在群众落后，这个组超社会，不适合群众要求。”泊镇供销合作社筹委会主任说：“河东群众传说五公共产了，闹得人心惶惶。”最后，实业科一个负责人在会上作了结论：“耿长锁这个组超社会，不适合群众要求，应该解散，改为互助组。”

八专署实业科的结论传达下来以后，农业合伙组就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服从“上级”的“指示”转为互助组呢，还是把农业合伙组坚持下去？耿长锁召开全组会，在会上组员们议论纷纷，都反对转为互助组。张近仁说：“我家连个喂牲口的地方都没有，退回互助组，那不是成心叫我为难！”乔万象说：“他们说农业合伙组不适合群众要求，咱们这些人不叫群众吗？他们谁来了解过！”卢墨林气愤地说：“咱没吃他，没喝他，他说他的咱干咱的，要听蝼蛄叫就别耩麦子了。”耿长锁和大家一块回顾了土地组的历史，深深感到这是穷人的命根，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起来的，谁也不能砍掉它。他说：“在互助组，农忙时大家都争着先做自己的活。咱农业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进了一步。八专署这个决定，是叫咱退回去，不符合毛主席的精神，不符合大伙的要求，咱们坚决不散！”大伙都表

示,今后咱一定要把组办得更好,叫那些说农业合伙组“超社会”的人看看!

农业合伙组不仅自己顶住了错误潮流,而且还继续发动全村群众办土地合伙组,走上组织起来的道路。在耿长锁的直接帮助下,一九四六年,五公村又成立了两个土地组,有一个副业组转为土地组,两个副业组同农业结合。这样,五公村就有六个类似土地合伙组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五公农业合伙组重新出现了新热潮。

一九四六年春天,五公又遇到了严重的干旱,农业合伙组有十几亩地种不上。耿长锁带领大伙打破了靠天吃饭的旧思想,发动全组男女老少,挑水点种。这不仅在土地组是头一次,在五公千百年来历史上也是头一次。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仅用两天就完成了春播任务。这一年,农业合伙组每亩地施肥达到一千斤,加上精耕细作,认真管理,庄稼长得又粗又壮,绿中发黑,亩产达到二百九十五斤,比一九四五年增产将近百分之二十,总产(包括花生折谷)达到三十万零六百八十斤,每亩地分粮一百五十二斤,每工分粮九斤,家家户户仓满囤流。这年,土地组还带头接受政府抗洪用绳定货,带头交纳爱国粮,支援解放战争。秋后,他们吸收了抗属刘树芳,贫农张砚,卢古楼入组,农业合伙组更加引人注目,华北平原上第一枝社会主义之花在暴风雨中开得更加鲜艳。

第四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 改革运动

砸碎封建铁锁链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政府代替了汪精卫汉奸政府，向中国人民发动了疯狂进攻。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

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等措施，五公村的封建经济大大削弱。五户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减少到二百八十五亩，平均每人五亩八分（较抗战前每人减三亩二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原来的一百零八户贫农中，有五十八户平均每人占地二亩以上，成为新中农，其它五十户每人平均一亩半地（较抗战前每人增六分三厘）。但是，五公村封建剥削根子并没有拔掉。封建地主阶级在五公还有着很大的经济力量，贫富差距仍是很悬殊。例如地主李建亭一家就有一百二十多亩好地，而他家的长工李二秃一厘土地也没有，只得终年扛活为生，地主仍然凭借土地剥削贫下中农。由于还存在封建的土地制度，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势力，不仅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其本身又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五公村人民迫切要求在经济制度上来一次根本变革，把自己的家乡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贡献力量。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前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为广大农民开辟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五公村充满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五四指示》一下达，就遇到了党内右倾思想的干扰。富农出身的支部委员，原抗联主任李凤祥，消极抵抗，不工作，在抗联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致使运动冷冷清清，严重阻碍了土地改革向纵深发展。区委决定让耿长锁代替李凤祥担任支部书记。党组织发动了雇农、贫农，建立了“贫农小组”，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并进一步发动全村群众，这样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广大贫雇农纷纷涌上街头，冲进地主富农的大院，同他们进行查租和清算斗争。“土地还老家”、“割掉封建尾巴”等大字标语贴满了街头。

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地主富农则力图保存自己的势力，继续进行封建剥削，他们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和捣乱。富农李大林，疏散、窝藏财物，设立两处“防空洞”。地主李茂修与三名党员干部拉家族，拜把子，请吃请喝，进行拉拢腐蚀。他还趁夜深人静，偷偷在“土地还老家”的标语上添了一个“不”字，改为“土地不还老家”，妄图抗拒土改，进行垂死

挣扎。

对于阶级敌人的进攻，党支部发动全村群众进行了揭发检举，很快查清了篡改标语的事件，对李茂修进行了批斗。他们又在几天之内，连续挖出两个“防空洞”，查获了地主富农妄图转移的八百多斤粮食和大批财物。接着，五公村贫雇农又按照党的政策，割掉“封建尾巴”，把庙会地、族田地共七百四十四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庙会地、族田地绝大部分控制在封建宗族手里，原地富的土地数没有包括这一部分），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全国阶级关系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需要土地改革更加坚决彻底的进行。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毛主席指出：“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五公村广大贫苦农民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于一九四七年冬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以“前方打蒋军，后方挖蒋根”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复查运动。

为了彻底铲除穷根，五公村党支部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以使土地改革真正成为贫苦农民自己翻身解放的运动。针对一些农民“祖祖辈辈受苦受难，分田分地少不了咱”的模糊认识，以及村里“穷富是命里注定的”、“不扛活打短农民就没有饭吃”等流言蜚语，党支部组织群众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反复讲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党支部以李建亭对雇农李二秃的剥削为例，算了地主阶级剥削帐。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李

二秃前后给地主李建亭扛长活七年，种着一百多亩地，平均每年收一万五千斤粮食，除去生产投资，雇短工及开支李二秃的工资外，李建亭每年从李二秃身上剥削了上千斤的粮食。广大贫下中农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样一算，谁养活谁的问题就解决了。

与算剥削帐的同时，五公村还开展群众性的忆苦活动。广大贫苦农民通过自己的一笔笔血泪史声讨了地主阶级的罪行，找到了自己穷根所在，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挖穷根、搞土改的斗志。他们组织起一个一千多人的贫农团，很快便形成一个斗地主、分田地的群众高潮。

正当土改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影响到五公。一九四七年冬，工作队到了五公村，他们按照刘少奇“搬石头”的黑指示，一进村就解散了党支部，勒令耿长锁等七十多名干部隔离反省，并收了民兵的武器。工作队还乱划阶级成分，把六十八户中农定为富农，并封了他们的门，“农业合伙组”因为有骡子，有副业作坊等集体财产，竟被工作队视为“富农组织”。工作组让一些作风不正派的二流子掌握领导权，却把农业合伙组的贫雇农拒于大门之外。

看到工作组的这些作法，耿长锁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制定的土改路线，他和村里贫苦农民广泛交换了意见，认为工作组所作所为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就找到县委一个负责人反映了情况。耿长锁说：“工作队执行的是什么政策，他们为什么不依靠广大贫雇农？我真有点不明白。”那知那个负责人盛气凌人地说：“要那么明白干什么？糊涂着点吧！”耿长锁听着那位负责人的回答不象话，就又找县委书记，因为饶

阳是冀中区党委亲自掌握进行土改工作的，饶阳县委就把耿长锁反映的情况，向冀中区党委进行了汇报。

哪怕风雨一时狂，驱散乌云见太阳。正当土改运动处于紧要关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以后又发表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重申了党在土改运动中的政策，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路线，拨正了土改运动的航向，使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重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发展。

一九四八年春节过后，冀中区党委重新派了土改工作组到五公。新工作组进村后，恢复了村党组织和村政权的工作，将错划成分的六十八户改正过来，最后全村定出五户地主富农，并对贫农团进行整顿，解决了成分不纯的问题，农业合伙组的贫雇农也参加了贫农团。

为了更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算地主的罪行，工作组帮助五公党支部组织了诉苦大会。这一天，太阳还没有露头，会场上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村的墙上、大树上贴满了“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有冤的诉冤，有仇的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大字标语。民兵们、儿童团员们扛着钢枪、红缨枪，警惕地保卫着会场。

几个手持钢枪的民兵，将地富押进会场，人们朝前涌着，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大会刚刚开始，一个青年妇女扶着一位大娘，从人群中挤到前而来，村里人都知道，这位大娘就是当年地主李老赢勾结官府，仗着他的党弟土匪头子李化南

的势力逼死的贫农李铁头的妹妹李蕊。李蕊愤怒地控诉了李老赢的罪行。

贫农李存立，整整给地主李老赢扛了四十年活，到头来被赶出了门，沿街乞讨。李存立的儿子李铁头眼看着父亲的血被榨干了，宁死不走父亲走过的道路。一年夏天，李老赢要铁头给他锄地，李铁头瞪圆了眼睛说：“穷有穷的志气，我就是不伺候你。”在李铁头的带动下，这年许多贫雇农都拒绝给李老赢下活。李老赢就此怀恨在心。有一天，李老赢聚赌请客，偷了铁头家的鸡，铁头娘闯进他的大院里，同他说理，却被李老赢打得血肉模糊，推出大门。李铁头和乡亲们怒火满腔，要找狗地主算帐。恶霸李化南举枪威胁群众。第二天，李铁头求人写了呈子告了李老赢。没曾想，衙门来了人，却拿出传票要将铁头带走。铁头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抡起拳头将衙役打得狼狈逃窜。第二天，又来了四个衙役，将铁头打的死去活来，扔在车上，扬鞭而去。铁头爹有气无力地跟在车后呼喊，李老赢上去一脚将铁头爹踢昏过去。三个月后，枯瘦如柴，遍体鳞伤的铁头被抬了回来。李存立抱着救活儿子的一线希望，将讨来的一碗粥递在铁头嘴边，可铁头一口粥也未进，竟连吐几口鲜血，含冤死去。铁头爹一气成病，不久也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离开了人间。孤苦伶仃的铁头娘，日夜怀念惨死的丈夫和儿子。有一天，她带着满腔的仇恨找到地主李老赢那里算帐，狠心的豺狼李老赢又将铁头娘活活打死。

台上诉的血泪仇，激起台下的阶级恨，会场上的口号声犹如大海的怒涛，一阵高过一阵，愤怒的群众举起一双双铁拳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恶霸地主李老赢！”“消

灭封建势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会后，政府依法把李老虞逮捕法办。

斗倒了地富，五公贫雇农在党支部和工作组的带领下，没收了地主阶级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多余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千百年来，套在五公贫苦农民头上的封建铁锁链，终于彻底砸碎了！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工作组的同志提出，要把分给农业合伙组的土地联在一起，以利经营。耿长锁代表农业合伙组表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分回地，把好地分给别的贫雇农吧，我们要次地。”分浮财时他们也百般推让。农业合伙组的高风格，受到了全村贫下中农的赞扬。土地、浮财很快就分完了。农业合伙组的贫农分得土地二十六亩。

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手里，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们是多么高兴啊！手中捧着盖有人民政府鲜红印章的土地执照，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人们跳啊，唱啊！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一九四八年四月，五公村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工作。党的组织公开，广大贫雇农参加了评议党员的工作。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着重解决土改胜利以后继续革命的问题。接着进行了组织整顿。乔利广、徐树宽等十二人被吸收入党，耿长锁担任了支部书记。经过土改运动的洗礼，五公村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

保卫胜利果实

在解放战争中，由于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五公广大贫下

中农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支前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动员了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早日打倒蒋家王朝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春，正当蒋匪军疯狂侵犯解放区时，五公村人民组织起来积极支援了在前方英勇战斗的解放军。当时，正是春节刚过，天气寒冷的时候，五公一带又连续下了几天大雪，农业合伙组一听说又有支前任务，马上决定出一辆大车。耿长锁刚把这事一提，贫农李第二就站了起来：“这趟差事，我去！”耿长锁看看他说：“不行，看你那衣服，不冻坏了你。”李第二说：“打老蒋，心里热乎乎的，冻不坏。”他坚定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李第二赶着他的大车，和支前大队一起，冒着刺骨的寒风，一个劲往前赶。一次突然遇上了敌人的空袭，四五架敌机轮番着轰炸、扫射，公路上成了一片火光烟海。李第二赶的大青骡子蹦了起来，车上粮食口袋被打了好几个洞。为了保护支前的粮食，李第二冒着生命危险把大车一直赶到了安全地带。李第二完成了送公粮的任务后，在回来的路上，吃了一路窝头，把组里补助的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会计。他说：“这是大伙一颗汗珠摔八瓣挣来的，来的不容易。咱支援解放军，不用补助。”在农业组的带动下，全村先后组织四次运粮队，将八万斤公粮送到前方。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晋察冀军区在大清河北和平汉铁路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战役，五公村多次组织了担架队支援前线。当时，有的单干户借口家里只有一个能干地里活儿的，不愿出人，农业合伙组则把战勤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组员支

前出发时，全组都作保证说：“你们年青力壮的支前去吧。支援多久也没问题。组里的活儿、你们家里的困难，大伙兜着。”合伙组的行动，受到群众的好评。农业合伙组参加担架队的李砚田、乔万象等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每次都胜利完成了任务。

除了送公粮、出担架，五公人民还派出自己的民兵，直接参加解放战争，消灭蒋匪军。五公民兵参加了解放沧县、石家庄、保定和天津等地的战役。一九四九年，五公民兵又参加了围攻太原的战斗。在这次战役中，张端同志和解放军一起坚守在战壕里，连续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胜利完成了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五公村还有一百多名贫雇农的子弟为了解放全中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耿长锁夫妇送自己不满十八周岁的儿子耿得录参了军。新婚不久的周淑贞勉励丈夫到部队，不要惦记家里，彻底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五公人民的优秀儿女，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南征北战，英勇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功绩。

一九四八年春天，五公村土改运动基本结束以后，广大贫下中农掀起了生产高潮。他们在严重的干旱面前，平整土地，运送肥料，生产搞得热气腾腾。农业合伙组的组员们说：“过去打粮给地主，现在打粮为解放，我们一定多打粮食，支援解放战争。”他们打井抗旱，增施肥料，精耕细作，亩产达到二百九十一斤，超额完成了交纳公粮的任务。

土改以后，五公村的广大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她们在乔

文芝“妇女做鞋组”的带动下，掀起给部队做军装的热潮。这些妇女每天披星戴月，自带干粮，顶严寒，冒风雨，步行十几里到沃堤村做军衣。她们在一个月时间做军装万余件，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五公人民用支前参军、增加生产的实际行动，保卫了胜利果实，为全国人民彻底解放贡献了力量，伴随着胜利的凯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五章 在斗争中发展的初级社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五公村的封建势力被打倒了，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但由于农民个体经济生产规模非常狭窄，占有的生产资料非常单薄，他们仍然处于贫困地位，特别是遇上自然灾害等袭击，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走上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而有些富裕农民则力图把自己变为富农。五公村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九四九年五公村就有三十来户买卖土地。

贫农李文瑞一家十一口人，有年迈的老娘和几个幼小的孩子，只有他一个人劳动，生产上缺这少那，土地不能按时深耕播种、施肥保墒，收成很少。年年不够吃，只得忍痛卖掉一亩半土地。

贫农李相由于旧社会长期给地主、富农扛长活，家底很薄，分到了土地后仍然缺乏农具和畜力，无力耕种，只好把分得的土地全部卖掉。后来仍然无法生活，又卖了房檩。

贫农张庆周的孩子突然得了重病，没钱医治，也被迫卖了几亩地。还有几户，连赶上几次丧事，拉下亏空，不得不卖地还债。除了买卖土地外，有的贫下中农在庄稼青黄不接时急需钱用，被迫贱价卖青苗。与此同时，五公村有些富裕户又买地，买青苗，雇工，放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五公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耿长锁领导的农业合伙组，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了避免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还在解放前夕，他们就不顾自己的困难，收留了四个孤儿。

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孤儿李转、李坛的老姑姑(家住外村)带着她们找到了耿长锁。这位老人还未开口，两行悲痛的泪水先流了出来，半晌才哽咽着说：“组里收下这两个孩子吧！他们没有了爹娘，缺吃少穿的可怎么办呀！”长锁看着两个幼小的孤儿天真的面孔，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他深深感到农业合伙组有抚养这两个孤儿的责任，答应找组员们商量商量。

在组员会上，耿长锁怀着沉痛的心情说：“咱们祖祖辈辈受苦受难，咱们没法克服困难，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指出了组织起来的路，救了咱们。眼下两个孩子遇到了难处，怎么办？叫不叫入呢？”受过苦难的人，最容易激发起阶级感情，旧社会悲惨生活一幕幕从组员脑海里闪过，大多数人都同意把这两个孤儿收下来。但是也有个别人看到两个孩子只能吃，不能干，还要叫别人照顾，认为留下来是个累赘。他们不满意地说：“多来些这样的人，大伙再拿上棍子要饭去吧！咱们合伙组才办了四、五年，破篮子和打狗棍还在棚子底下放着呢。”

耿长锁望着一个个穷兄弟的面孔，又耐心地引导说：“眼下咱们虽然有些困难，但是再紧巴也应该把这两个穷人家的孩子收下，正是破篮、打狗棍还在棚底下放着，咱就不能看着这两个孩子去要饭。”就这样，孤儿李转、李坛在合伙组里落了户。不久，农业合伙组又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贫农孤儿李秀英、李孟杰。农业合伙组成了四个孤儿温暖的家。耿长锁的老伴徐树宽主动承担了照料孤儿的工作。春天，她给孩子们做单衣，秋天，她又把棉衣送到孤儿们的手里，鞋子破了给补好，房子坏了找人给修。孩子们吃的、住的、用的一切费用，合伙组都包下来。

一九四九年，农业合伙组里也出现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个别组员在刘少奇“发家致富”思想的影响下，看到组里农业分红是地劳各半，买地入组有利可图，也就开始买土地。老组员李辉廷用六千斤小麦买了四亩地，并准备再买一些，其它组员也有想买地的。这件事引起了耿长锁同志的严重注意，他反复思考：照这样下去，不就会有人富的嘴里流油，有人穷得地无一垅吗？我们决不走这条路，应该帮助大伙认识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才是命根子，广大贫下中农应该依靠集体力量一起进入社会主义。耿长锁决心把徘徊在十字路口的组员重新引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耿长锁先到区委进行了汇报。按照区委的意见，他召开了党员会先统一了思想，接着又连续召开了几次组员大会，发动大家讨论买地到底是走什么道路？耿长锁在会上说：“毛主席、共产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是叫我们过共同富裕的日子，现在有人卖地，就有人买地，地有一买一卖，人就有一富一穷，这是

共同富裕的道路吗？”听了耿长锁的话，李辉廷站起来说：“我分了粮食分了钱，吃不了花不了，买几亩地也不犯法，我把买的地放到组里谁不沾光？”耿长锁说：“如果咱们不组织起来，那里会有余粮余钱呢？有了余粮存款应该把它投到组里，用在发展集体生产上。买地放债那是过去地主老财剥削穷人的办法。咱们不能刚刚填饱了肚子，就从别人嘴里抢食呀？”经过几次耐心帮助，李辉廷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在组员会上流着眼泪说：“咱卖了一辈子苦力，连人应该靠劳动吃饭全给忘了，只想自己发家致富，多糊涂啊！”原来想买地的组员说：“要不是长锁这一番道理，咱差点也走了邪门歪道了。”经过充分讨论，农业合伙组把分红比例地劳各半改为地四劳六，从分配上限制了买卖土地。

通过这件事，使组员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发展方向，丢掉了为多分红买地入组、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念头，合伙组又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前进了。

合伙组内部买地的问题解决之后，耿长锁又进一步想：两极分化的并不是偶然现象，合伙组内部买地的现象虽然刹住了，可是全村的困难户还有不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和组员们商量研究决定，先从帮助困难户做起。单干户张僧没有牲口种不下麦子，组员就帮助他耕地种麦；李可玉等缺少人力畜力，组里就支援人力畜力，帮助他们播种收割。就是这样，耿长锁和五公村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胜利以后，没有歇脚，他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阻止了两极分化趋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开始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和富裕中农竞赛

毛主席说：“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耿长锁农业社和富裕中农李亨通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的竞赛，就是这样。

李亨通是五公村有名的“小诸葛”，他有文化，有技术，家有十几亩好地，一牛一车，犁耙绳套样样齐全，多少年来，李亨通是作着在五公村拔尖的美梦渡过的。为了实现他的发家计划，李亨通拚命干活，省吃俭用，一心想着发家致富。别人穷了，他撇嘴；别人富了，他生气。一九四五年，他和土地合伙组竞赛过，没捞着什么便宜，心里很不服气，背地里拍着胸脯说：“穷小子搭伙想要赶上我，真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府里卖经文。”土地改革以后，他和农业合伙组又开始了第二次竞赛。

一九五〇年，李亨通正式向农业合伙组提出了挑战。组员们听说李亨通要和合伙组竞赛，纷纷说：“咱们不蒸(争)馒头也要蒸(争)口气，争取把活茬样样做到单干户的前头。”耿长锁和支部委员们，分析了当时各阶层对“组织起来”的态度，认为要教育农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在李亨通的背后站着以富裕中农为主体的自发资本主

义势力，在合伙组的后面，站着广大贫下中农，这是一场争夺群众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决不单纯是生产的竞赛。党支部从两条路线的高度来教育组员，提高组员思想认识，决心打胜这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夺战。

竞赛开始了，农业合伙组调动全体组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扬为革命种田的精神，改良了土壤，实行了合理密植，增施了肥料。李亨通也鼓足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劲，存心要胜过合伙组。他把地耕的更细更匀，上粪多，苗锄了三遍还要锄。因为这一年风调雨顺，李亨通凭着他的上地多，农具全，畜力壮，干得还比较顺利。到秋后，合伙组的“水里红”和李亨通的“齐头黄”谷长势不相上下，李亨通却故意指着合伙组的一块最次的庄稼说风凉话：“你看，还是人家合伙组的庄稼，长得就是好。”这一年的竞赛，李亨通不仅不认输，反而更要和合伙组比个高低了。

一九五一年，土地合伙组改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进一步加强对组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总结了前年生产斗争经验，更合理地调配了劳力。组员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耕牛不足就用镢刨，水车不足就担水浇，春苗一出土没几天，就齐刷刷的一片，又粗又壮。李亨通看着合作社人心齐，干劲大，庄稼长势好，心里就像烧了一把火一样。他起早归晚，加工加点地干，还偷偷煮了许多豆当追肥，晚上送到地里。他明明锄了八遍地，却对别人说只锄了六遍。这年秋后，合伙组粮食亩产达到三大口袋（四百斤左右），而李亨通为了装门面，扬都不敢扬净，亩产才勉强凑足三小口袋，产

量比合作社的差了一截。

一九五二年，五公一带遇到了大旱，从开春到麦收滴雨未下，太阳象火一样的烤着大地，每天刮着烫人的旱风，高粱、谷子、玉米的叶子先是打了卷，又渐渐的枯黄了；棉花、花生棵子里爬满了红蜘蛛，眼看庄稼要遭大灾。为了战胜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年春天，合作社在耿长锁的带动下，战天斗地，日夜苦战，一连打了两眼新水井，修复了一眼旧井，使干旱的土地得到了灌溉。棉花、花生地里使用喷雾器，用农药杀虫，几天就把虫子打了下去，合作社战胜了干旱和虫害，庄稼长得水凌凌的一片葱绿。

这一年，李亨通憋足了劲，要转转局面，与合作社决一胜负，他的地里不仅底肥铺得厚，刚见苗就又追了一次豆饼。但是，单干的弊病并非豆饼所能补救，李亨通由于无力打井抗旱，庄稼的颜色越长越黄。紧接着他的老婆又病倒了几个月。这个富裕中农唉声叹气，顾里顾不了外，顾人顾不了地，一下子象老下去几年。他的眼睛陷下去，颧骨高起来，两撇小胡子也变得苍白了。回到家跺脚喊道：“坏了，坏了，天灾人祸可要把我毁了！”到了这年秋天，雨水又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李亨通的谷子摊在长满荒草的地里，眼看一年收成全完了。

在同李亨通的竞赛中，耿长锁一再向组员们说：“咱不是为了比垮一个李亨通，而是为了用事实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教育群众。”到了李亨通跌倒爬不起来的时候，合作社组织了支援大队，很快地把李亨通的谷子运到场上，用席子严严实实地苫了起来。看到这情景，一贯挖苦讽刺合作社的李亨通也感动地说：“大伙费心，大伙费心。”不久，他也参加了农业生

产合作社。

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建国初期，资产阶级采取各种阴险狡猾的手段，同无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也把黑手伸向五公农村。

一九五一年春天，一个叫李恒信的人来到五公。他拿出“介绍信”，自称是北京某大学机关生产人员，准备在五公设立花生加工站。李恒信一进村，就同副社长魏连玉打得火热，在五公站下了脚。他首先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腐蚀五公干部、社员，整天大吃大喝。耿长锁见了这一套，从心眼里反感。他想：现在正是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地搞革命，搞建设，他怎么一天到晚不工作，净吃喝玩乐呢？一天，李恒信想拉耿长锁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坚决拒绝了。这个家伙就盛上满满的一大碗肉，送到耿长锁面前说：“大伯，咱都是革命干部，一家人嘛，今天你怎么也得吃下这碗肉。”耿长锁严肃地回答说：“革命干部是干革命的，你整天净来这一套，象个革命干部吗？”坚决把他顶了回去。

过了几天，耿长锁又发现有些社员买李恒信的布，心里更是怀疑：怎么机关生产还卖布呢？他一打听，原来李恒信拿了一匹布叫合作社分给社员，耿长锁马上制止了这件事，并嘱咐大家：“和李恒信打交道，可要多动动脑子，这个人不正派。”

有一天，李恒信对农业社负责经营副业的李根立说：“跟我做趟买卖吧！咱把好花生拉到卫里（天津）卖大价，用次花生

先顶好花生交国家，赚了钱，平半分。”李根立把这些话告诉了耿长锁。耿长锁气愤地说：“这不是坑害国家，抽国家的筋吗？咱可不干。咱们是农业社，靠劳动吃饭，只能发展集体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绝不能搞投机买卖坑害国家。”耿长锁又找李恒信说：“你怎么净变着法坑国家呢？这种事我们农业社绝不能干；你要不趁早改过，也不会有好下场。”

可是李恒信利令智昏，他被耿长锁顶了几次以后，仍不悔改，又想出一个坏主意来。他先低价买了四十大桶油，然后对李根立说：“咱们一块把这些油卖了，你们无本求利，一次就能赚个大骡子。”耿长锁发现这件事后，又找李根立说：“你怎么老不听劝呢？咱农业社就是搞农业，歪的斜的不能干，咱不吃那没汗水的粮食。”李根立还想说服长锁，他分辩道：“光凭地里几棵庄稼，一个汗珠摔八瓣，忙活三百六十天，不就是长出几个红窝窝头？我这一趟就是一匹大骡子。”耿长锁坚定地说：“咱不找那个便宜，别说一头大骡子，你就是赚个金马驹来，在我跟前蹦三蹦，我也不稀罕！”

经过几次斗争，李恒信的阴谋不但未能得逞，而且越来越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最后，他狼狈地溜出五公村。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五公村人民揭露了李恒信种种卑鄙勾当，经过调查核实，又发现李恒信曾偷出农业社的图章开了空白介绍信，招摇撞骗，搞投机倒把活动。奸商李恒信的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搏斗中，打了个大胜仗，有力地巩固了这块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粉碎篡权阴谋

一九五二年三月，耿长锁随中国农民代表团出国访问，历时三个月。在这期间，五公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斗争。

在端午节前夕的一天晚上，农业社副社长魏连玉事先未经党支部讨论，违反了社委会关于在耿长锁外出期间暂不改选的决定，擅自召开选举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提出改选社的干部。一开会，魏连玉就抢先说：“长锁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你们说，还有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有几个受了魏连玉拉拢的人趁势说：“对呀，连玉什么工作也拿得起来，咱就选连玉。”“连玉能干……。”他们的话还未说完，阴谋就被贫下中农识破。老贫农张近仁大声说：“不能选掉长锁！社里没个好当家的可不行。”李第二也站了起来说：“谁不叫选长锁，这是安的什么心！”其他社员也纷纷说：“不选长锁不行！”“长锁不在也得有被选权。”绝大多数组员都纷纷发言坚决拥护耿长锁当社长。五公贫下中农在十几年的斗争中认识到，耿长锁是带领大家奔向社会主义的好带头人，合作社离不了他，他们团结一致，粉碎了魏连玉的篡权阴谋。

魏连玉策划的这场篡权阴谋活动不是偶然的，它是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妄图改变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方向的一次丑恶表演。魏连玉自幼就随父亲在绳铺做买卖，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和几个地主子弟打得火热。后来，他在县里旧商会当上了一名小小的“干事”，成了为地主资本家效劳

的走卒，沾染一身商人市侩习气。“七、七”事变以后，他父亲开的绳铺倒闭了，魏连玉跑到河南混事，学会了一套能拐就拐，能骗就骗的歪“本事”。一九四二年回村后，他利用担任联络员的机会，经常同圣水伪警备队长一起吃喝玩乐。一九四五年，他加入“土地合伙组”，土改中伪装积极，又因能说会道，不久混入党内，并窃据了合作社副社长的职务。日子一久，他的剝削本性便冒了头。在社里依仗窃取到的职务，任意挥霍集体财产，想方设法搞资本主义经营，并在社内挑拨干群关系，甚至发展到打骂和开除社员。他的这些活动不止一次地遭到耿长锁及合作社社员们的坚决抵制和批评。从此，魏连玉对耿长锁怀恨在心。他认为耿长锁这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是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梦想有一日把“耿长锁合作社”改为“魏某合作社”。他经常说：“要是我当了社长，这个社早大发了。”但是，耿长锁在社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在耿长锁出国以前，他的夺权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这次耿长锁随访问团出国访问，他认为机会到了，赶紧活动起来，一连几夜串家走户，用花言巧语欺骗几个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发财致富的思想煽动极少数自发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妄图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夺权上台。他甚至得意忘形地向耿长锁的儿子耿德祿说：“你爹回来，就得听我的了！”魏连玉满以为经过他的这番布置策划，只要社员大会一开，他登台一呼，受他拉拢的那些人举手赞成，农业社社长的职权就可到手，他那发财致富的道路就可通行无阻。可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绝大多数社员不听他那一套。结果不但社长未当成，而且受到党内的严厉批评。

一九五二年秋后，社再次扩大，为了团结教育魏连玉，又

让他当了总务股长。但他不仅没有从篡权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嫌“股”太小气，便私下把总务股改为“总务处”，并写了一块“总务处”的大牌子挂在大门上。这位“总务处长”一上任，就挖空心思地做了一套新的计划。他建议要在村北开辟一条新街道，建筑一座阔气的办公室。耿长锁批评他说：“你出的这个馊主意，群众通不过。漂亮的办公室长不出庄稼来。我们应当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方针。”魏连玉拒不接受批评，胡说什么群众接受不接受还不是看干部，干部要说办，群众那个能不动。耿长锁又严厉批评他说：“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带领大家干社会主义，千万不能带着群众走歪门邪道！”同时把这个问题交给社员讨论，经过讨论，社员们都同意了耿长锁同志的意见，反对魏连玉的意见，他的那个“计划”宣告破产。但魏连玉仍然不死心。为了显显这个“处长”的威风，他用队里粮食换了一个新马鞍，一出门就骑马。社员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生气说：“当了干部就骑马抖威风，简直是瞎胡闹，拿集体的钱瞎糟践！”魏连玉却说：“什么瞎糟践，才四十斤玉米换的，要凭值，那可值多了。”耿长锁批评他说：“四十斤玉米也是社员的血汗，没用的东西一分钱也不能花。”一九五三年春天，社委会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决定把魏连玉的“总务处”和他的“处长”一起撤消。

撤消“总务处长”之后，魏连玉的资产阶级本性就更加彻底暴露出来。他对党不满，攻击党在农村的互助合作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在社员当中散布反党言论，在社员中制造思想混乱，严重的影响了集体生产。这个严重问题，引起了五公村党支部的警惕和密切注意。党支部认为魏连玉的问题决不是

简单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决定对魏连玉进行政治审查，后查清他在河南当过国民党的警察班长，入党时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正当党组织准备对魏连玉进行严肃处理时，他得病死去。

魏连玉事件，对五公干部和广大社员是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它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同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坚决斗争，才能保证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迈出新的一步

一九五二年五公村的大旱，从开春到秋后只在麦收时下了三四指雨，灾情比一九四三年还严重。单干户的豆子、棉花、花生的叶子眼看着落光了，庄稼旱的半死不活，粮食亩产只有七十斤；而耿长锁农业社治过虫的棉花，棉桃累累，用水浇过的庄稼又黑又壮，粮食亩产达到二百零四斤。这种情况再一次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优越性。一九五二年秋，在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精神指引下，在耿长锁农业社的带动下，在打井种麦的热潮中，五公村又成立了十六个合作社（原有四个老社）和十二个互助组。

群众组织起来后，为了加强领导，五公村党支部组织了打井委员会，计划种麦前在全村打成二十三眼水井。但是，社组之间互争干部、劳力和水源，发生了矛盾，集体劳动与土地分散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都成为战胜旱灾，打井种麦的严重障碍。

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连续召开了四次支委会进行研究，

一致决定：加强领导，把全村组成一个大社，统一调配干部力量和安排劳力，用更大的集体力量打好打井种麦夺丰收这一仗。接着党支部召开全村干部会议，提出了并社的建议，经过大家讨论，组成了并社筹委会，起草大社章程，在四十多天的筹备工作中发动群众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复的思想教育。

当时，五公村的三十二个社组，生产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最好，因此，有个别社员不太赞成并社。一次讨论会上，李辉廷说：“咱好不容易改变了沙、碱、沟，搞了四百八（单产四百八十斤），三把大锅换来九个大骡马，还是别跟他们掺合好。”有的社员也说：“咱不能跟他们混到一块儿呀！”但多数社员却认为：“早晚要转大社，赶早不赶晚。”最后耿长锁用启发诱导的方法问那个不同意并大社的社员：“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咱农民走什么道啊？”那个社员回答说：“那不用问，叫咱走共同富裕的道呗！”长锁又说：“今天，咱们的底子厚，就不并社，那么再过几年，差的更多了，光咱一个小社过好，能叫共同富裕吗？”几句话，就把那个社员说服了，大家一致同意，并入大社。

毛主席曾经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在五公村的并社过程中，广大贫下中农同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当时在牲口折价、土地分红等问题上争论很激烈。有的富裕中农主张按劳三地七分配，甚至有个别人主张按劳一地九分配；有的则认为并大社自己吃亏，说什么“这一下可是高粱秸剥了皮，成了光杆，黑豆碾了皮，成了光仁（人），从牙缝省下的这点财产全完了；肉

疙瘩和排骨可就掺合在一块分不出来了。”这些富裕中农提出这种分配办法，发出这种议论，实际上是反对并社，还想要单干。

为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党支部发动群众，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让大家认清建大社的必要性。在酝酿并大社时，五公村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不论是在田野里，饭桌上，碾道旁，还是会议上，到处都谈论着并社问题；有的家庭中青年和老年人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支部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战胜了资本主义倾向，使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饶阳县第一个全村大社在五公正式诞生了。全社共四百零一户，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耿长锁当选为大社社长。五公村在合作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贫下中农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砍不倒的合作社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在土地

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及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则从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狂热鼓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宣扬“剥削有功论”,主张个人“发家致富”和“四大自由”;他攻击广大农民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革命行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对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加以摧残,妄图把它扼杀掉。

合作化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五公村表现得非常突出。耿长锁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场路线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耿长锁出席了河北省首届劳模大会。他在会上介绍了他们七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河北日报》报导了耿长锁农业合伙组的经验。河北省农业展览馆展出了耿长锁农业合伙组的先进事迹。但是,当时河北省委内却有人散布,耿长锁农业合伙组“只能精神动员,不能物质动员”,甚至说什么“耿长锁的组好是好,就是不能推广”。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华北局在北京召开了农业互助合作座谈会,耿长锁作为唯一的一个农民代表随同河北省农林厅负责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会上,围绕要不要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个别领导人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公开反对农业合作化,不让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断言:“中国落后,工业才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不

能提倡社会主义。农业社不是发展方向，将来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也得解散。”在这场斗争中，耿长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发言中，用自己八年来办农业社的实践说明毛主席指引的“组织起来”的道路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普遍要求。不料，耿长锁竟因此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耿长锁这时反复地思考着一连串问题：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有人却说合作社不能走社会主义？这些人代表了谁的利益，他们是党的干部，怎么说话、办事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一样呢？他越想越觉得这些奇谈怪论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们和广大贫下中农不一条心，走的不是一条道。耿长锁并没有被党内一些“大人物”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种种奇谈怪论也丝毫没有动摇耿长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继续奋勇向前！

五公村连接着北京城，五公人民心向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坚决支持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耿长锁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此时，耿长锁的心情十分激动。他有多少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有多少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永不动摇。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否认现在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

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给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迎头痛击，也给五公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一九五三年春天，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批出现。对这种大好形势，刘少奇极端恐惧和仇视，他再次跳出来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指责合作化运动“急躁冒进”，“贪大求多”，叫喊要“反冒进”，或强迫农民解散合作社，或强迫农民退社转为互助组，或强迫已并的大社再划小。刘少奇在华北局的代理人于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三年三月连续三次下达“反冒进”的所谓“指示”和“通报”，他还直接指示河北省委，诬蔑耿长锁社“太大”。根据这些黑指示，原河北省委也于三月发出“反冒进”指示，把耿长锁社列为“整顿”重点。四月二十日，河北省委派出一个“副部长”，带领二十一人工作组，来到五公村，进行“整社”。

工作组进村后，既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也不听取县委和工作组内一部分同志的反对意见，那个副部长就首先找到耿长锁“谈话”，指责耿长锁不该办大社。那个副部长说：“还是办小社吧，这样既符合‘政策’，又省心。大社会把旗杆压弯的。”耿长锁回答道：“办小社我有把握，经济上对我也有利，可办大社是全村贫下中农的要求，我们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怎么能从个人省心想问题？”那个副部长没有想到，一个农业社的社长，一个普通党员，竟敢反对他的“指示”，于是就大发官老爷脾气，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说：到目前为止，

全国也没有这么大的社，大就是冒进，就是错误，就是路线问题。耿长锁针锋相对地严肃回答他说：“组织起来是毛主席的号召，反对组织起来才是错误，才是路线问题。”工作组见耿长锁顶得很硬，就又去找支部书记张振生，结果也被顶了回来。接着工作组又召开了全体支委会，会上工作组又发了一通“反冒进”的谬论，煽动支部委员把大社改为小社，可是还是没人同意。“这天晚上，党员们悄悄来到耿长锁家里，打听大社能否保住。长锁坚定地说：“大家沉住气，我看这绝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他老人家早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办大社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一个党员说：“看来头，工作组是非砍倒咱们大社不可了。”耿长锁攥紧拳头回答：“大社埋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砍了社砍不了咱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大伙看到长锁对办大社的决心坚定不移，满怀信心，下定决心要保住大社。

工作组砍社的活动遭到五公党支部的坚决抵制以后，他们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煽动社员退社。在群众大会上，那个副部长拉长嗓门说：“办大社是错误的，群众没吃的谁负责？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小社可以办，单干也是合法的。”他又说：“你们办大社有什么优越性，不就是打了二十多眼井吗？办大社是冒进，对大家没有好处，你们不要睁眼往火坑里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会场就象开了锅，社员们肺都气炸了，纷纷议论起来。社员们说：“这那里是整社，纯粹是来砸锅的，这样的会，我们不开！”没等散会，很多人都走了。结果群众大会开了个七零八落。

工作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又派人四处活动，到五公大队附近各村宣扬办大社的“坏处”，说什么“单干自由”，

“发家光荣”，并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向社员进行“说服”工作。可是他们费尽心机，还是没有一个人声明退社。

工作组长看到“说服动员”不起作用，就胡说五公党支部里有“坏人操纵”，立即对耿长锁和张振生进行了“秘密调查”，并以抗拒工作组的罪名，对耿长锁和党支部委员以及社干部进行“隔离审查”。工作组忙了十几天，也没审查出可以利用的问题，最后工作组竟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召开党团员会议，强迫党团员带头退社，并指定一些党员带领他原来领导的小组集体退社，说什么“退社是党的任务，要保证完成”。他们还用物质引诱，谁退社就拨给他们好牲口、好农具。他们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个大社就是个铁蛋蛋，也得给你们拨拉开。”

在工作组的压力面前，有少数人勉强“退社”了，但大多数党团员和贫下中农坚决顶住“砍社”妖风。他们说：“走集体化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不管哪里来的‘大人物’、‘大干部’，要让俺们合作社解散，除非是大树倒着长，河水倒着流。集体化的道路，俺们走定了。”就是被强迫离开合作社的社员也坚定地说：“我们终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工作组感到“砍社”任务再没法完成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五公村。

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支持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年十月，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再次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扼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罪行。毛主席严肃指出：“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那一年，都是错的。”“对于农村的阵地，

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五公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又取得重大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经历了严峻斗争考验的五公人民满怀激情地迎来了毛主席《组织起来》发表十周年。这个日子也是五公人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十周年。

河北省和各专区四百多名代表出席了庆祝大会。河北省委赠送给五公人民一面写着“社会主义之花”的锦旗,表扬了他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各地代表向五公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热情地希望这朵社会主义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在这个庄严隆重、充满胜利喜悦的庆祝大会上,被强迫退社的一百零七户又重新加入大社。原来七户没有入社的群众也参加了合作社。五公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四百零一户。

在庆祝大会的第二天,河北省第一个拖拉机站在五公建立;并在纪念大会上举行耕地表演。消息传来,人们欢欣鼓舞。双目失明的徐春老汉听到村里来了拖拉机,叫儿子把他扶到大道旁,他说:“我眼睛看不见摸摸也行啊!”当铁牛轰鸣着从田野驰过时,震动了多少人的心啊,铁牛向前飞奔,它象征着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必定要碾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五公村农业合作化取得的胜利,使社员们看到了更加美好的

前景。

在这个大喜日子里，五公广大贫下中农和农业社社员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表示：“我们按照您和共产党指示的‘组织起来’的道路，走过了十年。十年的经验使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的体验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幸福的大道、农民彻底翻身的大道。我们向您老人家保证：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继续前进。”

第六章 高级社的诞生

一场伟大的变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经风浪的五公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不断巩固发展。一九五四年，又有十八户农民，其中包括一些原来表示坚决不入社的富裕中农也入了社，农业社发展到四百一十九户（全村共四百二十六户），广大贫下中农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积极性，生产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初级社集体经营和土地私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

由于土地私有，初级社对土地的合理使用，有计划地进行某些农田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自发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还依恋着资本主义道路，不叫农业社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影响到集体事业的继续发展。

由于土地私有，初级社保留了“土地分红”，它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保留“土地分红”，就意味着土地多的社员（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中农）可以靠生产资料占有土地少的贫下中农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因为合作社的增产和收入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如中农徐平稳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但他拥

有较多的土地，尽管他劳动很不积极，但到年底仍然分红二百八十六元七角；而老贫农李和起一家两个劳动力，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分红只得八十二元，两者之间相差三倍以上，这就严重地影响了贫下中农的生产积极性。贫下中农说：“一年的劳动给别人白干几个月。”表现了贫下中农对土地分红的_不满。同时，土地分红的存在也造成了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对土地的依赖观念，他们的出勤率往往低于贫下中农，在干活中也挑肥拣瘦。第四生产队就因为中农多，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因而成了全社的落后队。有一个中农不好好干活，他儿子批评他，他说：“你吃你的工分，我吃我的地分，别管我！”土地分红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贫下中农的生产热情，同时也不利于调动土地较多的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初级社的这些矛盾表明，如果不废除土地私有，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生产就不能进一步发展，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所指出的那样：“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表达了五公贫下中农和全国农民的心愿，他们强烈要求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但是，五公是否具备了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呢？党支部研究分析了情况，认为五公村已经具备了转社的条件。

首先，五公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群众具有比较高的走集体化道路的觉悟。他们有十几年组织起来的历史。历史的发展

最生动的说明了合作化道路的无比正确和光辉前景，贫下中农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在斗争实践中，社员们逐渐培养了集体观念，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土地报酬比例逐步减少，社员们对土地分红的观念逐渐淡薄。所以，对于取消土地报酬，转为高级社，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就连李亨通也说：“快取消土地分红吧，这样更松心。”社员张书成说：“以前我和张云山为争地边，闹得不团结，还打官司告状。土地私有是祸根，界石是咱庄稼人团结的绊脚石，搬掉它，我们才能团结前进，我真心拥护取消土地分红。”

其次，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为转高级社准备了物质条件。一九五五年五公村粮食亩产已由一九五二年的 250 斤上升到 463 斤；牲畜由 93 头增到 103 头；水井由 3 眼增到 103 眼；水车由 3 架增到 68 架，大型农具、大车、旧犁、新步犁和双轮双铧犁等都有所增加。全社公共积累扩大到一万六千元。集体事业的发展，公共积累的提高，不但可以使农业社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可以解决社员因为疾病和其它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对于一些年迈体弱的老人和孤寡社员也能给予照顾。同时也保证取消土地分红后，绝大多数社员都能够增加收入。当时大家给老社员李辉廷算了一笔帐，一九五四年他一家共收入六百九十二元，其中土地分红二百零二元，劳力分红四百九十元，全家七口人，平均每人收入九十八元。就当年全社的收入来计算，如果改为完全按劳分配，每个劳动日可分一元一角，李辉廷家有两个劳动力，全年共做七百个劳动日，可收入七百七十元，平均每人一百一十元，比保留土地分

红时增加十二元,而且要按工分分红,他还可以多出工,收入将会有增加。通过给李辉廷算帐,社员们要求转社的积极性更高了。

第三个条件,就是在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五公的干部们已经摸索了不少可贵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在十几年来同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耿长锁同志为带头人的领导班子锻炼得越来越坚强,贫下中农骨干也不断涌现。全社共有71名干部,贫下中农成份的占51名,他们不但是生产的闯将,更是革命斗争的先锋,深受广大社员的拥护。在农业社内部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党支部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有能力带领广大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化方向再迈进一步。

根据上述条件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愿望,耿长锁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向河北省委提出把五公初级社转成高级社的问题。

取消土地分红,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完成农业由小农经济的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的。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被即将到来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形势吓破了胆,再次大搞“反冒进”,说什么“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需要“坚决收缩”。他们不顾毛主席对他们提出的严重警告,私自召开了五月中央会议,制定了“停”、“缩”、“整”的方针,在全国各地再次刮起一场“砍社”

妖风。在这股妖风影响下，有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对五公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畏首畏尾，不敢向前。他们对耿长锁说：“你们是红旗单位，不要带这个头，办坏了怎么办？还是等等看吧！”但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同年九月和十二月，毛主席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严厉谴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合作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驱散了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笼罩全国的农村右倾机会主义“阴霾”，照亮了全国五亿农民的前进方向。五公贫下中农学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热泪盈眶，老社长耿长锁激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打响成立高级社的第一炮。”李砚田也心情激动地说：“高级社咱早就盼着了，今天可盼到了，我们要带头办好。”他们的话表达了贫下中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五公党支部趁热打铁，着手进行转社工作。

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关键是取消土地分红，这必然要涉及到土地较多的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利益，由于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观念，他们对于取消土地分红有着种种想法和顾虑。有些中农说：“成立高级社我没有意见，一下子取消土地分红太厉害。”有的则散布说：“取消了土地分红还有过头吗？等着挨饿吧。”富裕中农徐转如闷在屋里几天不出来，拿着文书匣子，向家里人不住的唠叨：“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家伙，这下都完了。”富裕中农的这些行动，使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地主、富农大为高兴，他们趁机捣乱，蛊惑人心地说：“看着吧，今年转社，明年就得扎脖。”妄图阻挠和破坏转社工作。

然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五公大队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政策，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办起了高级社。

党支部向广大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他们深入贫下中农，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激发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用集体生产不断发展和社员生活不断提高的事实，进一步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使他们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有些劳力少的中农怕转高级社收入减少，贫下中农便同他们一起回忆对比，使他们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不消灭，自己的富日子也是不稳定的。老中农徐平稳土地多，对转高级社顾虑很大，耿长锁亲自找到徐平稳，和他一起回忆了解放前的生活情况。徐平稳说：“我爷爷去世时，留下土地 20 亩，四二年闹大水，卖给地主 7 亩，因欠债还不清，又卖出 7 亩，后来凭着父

子勤劳节俭,又买了5亩地,这地出出进进不容易,乍一取消土地分红,心里不痛快。”耿长锁尖锐指出:“旧社会你家几次卖地,正说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就拿这几年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不依靠集体,你能保证你那几亩地不再卖掉?有了一买一卖,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贫下中农不就又过上旧社会那种苦日子了吗?我们只有取消土地分红,才能踏踏实实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经过党支部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象徐平稳一样的老中农解开了思想疙瘩。特别是由于在处理生产资料折价入社的工作中,党支部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做到了公平合理,照顾了中农的实际利益,因而使中农感到满意,他们表示一定要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转入高级社,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了中农群众,这就孤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一九五六年元旦,五公高级社在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胜利地诞生了。从一九四三年组织起来起,五公人民就开始了改造小生产的斗争。广大农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随着高级社的建立,这个革命更加深刻了。五公村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高级社的优越性

高级社成立后,五公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了。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精神鼓舞下,春节刚过,党支部立即向全体社员发出“广开肥源,积极备耕,迎接春播”的号召。不几天,一场轰轰烈烈的砸冰挖坑泥的战斗就打响了。

当时，五公村东、村西和街当口各有一个大水坑，三个坑的面积足有六、七亩，水深四、五尺，多年来淤积的污泥没有人动。党支部的号召发出后，社员群众决心向三个大坑要肥。可是，正值隆冬季节，水坑结下了尺把厚的冰，坑泥能挖出来吗？有个思想很保守的老头摇摇头说：“要说这个时候挖坑泥那真是瞎吹，要是真能挖干这几个大坑，把我的姓倒过来写！”面对这个老头的怀疑，贫下中农更加坚定了打好积肥这一仗的信心。他们说，前人没干过的事我们要干，前人没创过的奇迹我们要创，我们一定克服困难把坑泥挖出来，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老社长耿长锁一马当先，举镐砸开厚厚的冰层。在他的带领下，社员个个干劲十足。有的社员在劳动中大腿被冰块撞破，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大坑终于向高级社献出了三十多车肥效很高的坑泥，为春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积肥运动结束后，五公人民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又掀起了一个防旱打井的高潮。五公村原是“大风刮、黄土飞、土地薄”的干旱地区。合作化以来，五公人民虽然在治沙找水上下了不少功夫，但由于土地私有制的限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然条件的旧面貌。现在五公人民又向干旱开战了。要论节气，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可是，五公的田野上却是一片腾腾热气。副社长乔利广，带领着打井队的同志们，豪气满胸怀。他们顶风冒雪，架起了人工架子，苦干巧干，一冬春打成三十眼井，战胜了春旱，保证了对小麦的灌溉。过春以后，五公田野上一片葱绿，庄稼长势喜人，社员们心花怒放，对夺取全年丰收充满信心。

谁知正在人们满怀信心,准备迎接大丰收的时候,八月初却下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足足下了一天一夜,五公村内外一片汪洋,天和地连成白茫茫的一片,四千亩秋季作物全部被水淹没,谷穗在水面上低着头,棉花飘着几片叶儿,棒子东倒西歪。五公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水涝。有些社员悲观失望,生产情绪低落下来,个别社员产生了吃国家救济粮的思想。

面对这严重的灾情,耿长锁心潮翻滚,他想:要是在旧社会遭到这么大的灾,穷人又得拿起要饭碗、打狗棍,卖儿卖女了。今天,我们有了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战胜灾荒。

他不顾雨淋和泥泞,戴着草帽,拄着棍子,带领党支部成员和社干部一块地一块地的查看水情;从地头转到社员的炕头,一家一家地摸着人们的思想。了解情况后,他们立即开会研究了抗灾问题。会上,耿长锁带领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所写的按语,毛主席在按语中指出:**“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支部,它领导群众做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毛主席的话,给了五公党支部以巨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信心。他们全面分析了灾情和社员的思想情况,决定首先深入群众,做好社员的思想工作,克服悲观情绪,树立自力更生战胜天灾的信心,然后依靠群众水中夺粮,争取丰收。

根据党支部的决议,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徐树宽同志在大雨还未停止,就挨家查看军烈属和五保户的房屋去了,她看哪家的

房子漏了，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修理，直到支部开会时她还在五保户家忙着。支委会结束后，她又淌着水出现在社员家了。她对那些情绪低落的社员说：“大伙儿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有合作社，天塌下来也能擎得住。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咱们要自力更生积极抗灾，水中夺粮。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块使，困难一定会克服的。”党支部的决议很快传到社员群众中，全村男女老少精神振奋起来，大家说：现在咱们人多条件好，水再大也不能被吓倒。咱们要发扬老四户“三把大镐创业”的精神，用自己的双手战胜这场灾害。社员们为战胜水灾出主意想办法，五公村掀起了群众性的抗灾热潮。党支部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一方面统一组织人力排水，加强秋季作物的管理，保住秋季收成，另一方面增加副业项目，自力更生，解决生活用款和生产资金。当时，国家给五公拨款八千元，被老社长耿长锁谢绝了。他们决心把党的关怀当作战胜灾害的动力，依靠自己的双手抗灾夺丰收，思想统一了，就来了革命干劲，雨过天晴，一场“战胜灾害，水中夺粮”的战斗打响了。

共产党员齐带头，贫下中农打先锋。当天下午，全社四百多个整半劳动力全部出动，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连夜挖沟排水。耿长锁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线，哪里脏、哪里累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的眼睛熬的通红，浑身滚满了泥浆，仍然坚持战斗不肯休息。被老社长的精神所鼓舞，社员们越干越有劲，连续三天三夜，挖成五十多条排水沟，排出了地里的积水。

与男社员挖沟排水的同时，社里“半边天”也出动了，这是一支斗志昂扬、引人注目的队伍，队伍里有十几岁的女娃娃，

也有年过七旬的老奶奶。社妇女主任徐树宽在带领壮年妇女参加抗灾斗争中,又带头战斗,和男社员一起挖沟排水。她摔倒了又爬起来,哪里水深向哪里冲。她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妇女社员们,壮年妇女们干劲更足了,年老的妇女们也坐不住了,她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参加了抗灾斗争。妇女们踏着泥水在棉田整枝打杈,光着双脚提篮掐谷穗,几天时间,就掐了几亩地的谷穗。为抗灾夺粮贡献了力量。

在五公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面前,困难低了头,洪水认了输。几天以后,躺着的玉米,东倒西歪的棉花,又挺起了腰杆,露出了葱绿的叶子。秋收后,五公粮食亩产达三百斤,籽棉一百六十六点六斤,花生三百三十五斤,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每人平均分配粮食四百六十五斤(包括种籽、饲料)。各生产队在注意群众生活的基础上,还扩大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农业生产投资,公共积累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七,公益金增加百分之二百零二,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也都有显著的增加。

农业损失副业补。除了原有的打绳组外,秋后社里又建立了打油、木器、运输等十多个副业组。耿长锁同志在参加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回来后,精神更加振奋,他亲自抓副业生产,白天搞编织,晚上摸黑拧麻绳拐子。他们一锤一拐,一斧一凿,整整干了一冬一春,用副业的收入,不仅把秋天的损失夺回来了,还为春季生产筹积了几万块钱的资金。

党支部在社员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又加强了对“五保户”的照顾,设立了“五保户委员会”,由政治副队长负责,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贴”、“定人照顾”。全社六十三户军烈属、

五保户和困难户,有二十五户通过“定工生产”、“定人照顾”解决了生活问题,另有三十八户从农业社盈余金内支出二万斤余粮,一万斤煤,三万斤棉柴,进行了补助。李尊三过去常提小罐打水,转高级社后社里派专人给他担水,他高兴地说:“社里对俺照顾的真周到。”虽然受了灾,五保户、烈军属户如同广大社员一样,生活水平不但没降低,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还有所提高。社员们高兴地说:“高级社好处大,旱灾涝灾都不怕,农副业生产搞得好,社员生活大提高。”

一九五六年的春旱秋涝被五公人民一个个克服了。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五公高级社,充分显示了她的优越性。

关于两条道路的一场大辩论

转眼间,冬去春来,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的五公高级社跨进了第二个年头——一九五七年,迎来了又一场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胜利引起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苏修叛徒集团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我党整风的时机,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企图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兴风作浪。

这时,五公村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利令智昏地跳了出来,向

社会主义、向高级社射出了一支支毒箭。地主分子李茂修的老婆、富农女儿范淑芳，公开走到队部办公室肆无忌惮地叫嚷：“我家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哪！……”富农分子李大林将土改时大队没收他的房子，私自占用，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活动。阶级敌人还以卑鄙的手段破坏队里的庄稼，煽动社员退社。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下，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公开宣传五公高级社“办糟了”，“办得村穷户穷，没吃的”。富裕中农刘振清借高级社受灾的时候，就不参加劳动，偷偷跑外搞投机倒把，这时又鼓动一些社员和他一起向支部提出退社。当这个要求遭到批评后，他又要求队长锁多给他分自留地，并挑动群众和干部吵架。这个富裕中农还多次到省里告状，胡说五公高级社办坏了，不管饭吃。还有的富裕中农穿着皮袄，骑着自行车到处要饭，煽风点火。五公村严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深刻地表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要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向社会主义进攻，借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要巩固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特别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了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刻尖锐的批判。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主席热情地赞扬了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肯定了合作化的方向。毛主席以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经过四年艰苦奋斗，使绝大多数社员成了余粮户的事实，说明合作社的优越性，指出：“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毛主席的指示有力地回击了右派的猖狂进攻，为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反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为了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教育社员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秋收后不久，五公村党支部根据党中央八月八日发布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在全体社员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社员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武器，对资本主义势力给予强有力的回击。

新旧社会两重天，为啥敌人乱叫唤？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就是想变天，想复辟。五公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刻认识到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协助公安员查获了破坏生产的几起案件，对李玉青等阶级敌人实行了专政；批斗了范淑芳、李大林，大刹了地富的反革命气焰。

与此同时，五公贫下中农同自发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有的富裕中农说，合作社不如单干，生产年年低。贫下中农就和他们算细帐，用事实驳斥这种谬论。老四户之一卢墨

林老汉激动地说：“谁说高级社办糟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远的不说，就说去年闹水，要是在旧社会不知会有多少穷人逃荒要饭，饥饿而死！可是有了社会主义，咱们成立了高级社，凭着集体力量，战胜了水灾，社员都过的很好，今年，我们又取得了亩产 300 斤的好收成，比没有组织起来时要多五倍，这一比一看不就清楚了吗？高级社不是办糟了，是办好了！”卢墨林的话代表了贫下中农的心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高级社不是办糟了，是办好了！”

可不是吗，自打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以来，贫下中农的日子真是上楼吃甜棒——步步高，节节甜。就拿耿建民一家来说，解放前，家里仅有一、二亩薄地，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却仍然不得温饱。遇上灾荒年就得借债，逃荒要饭了。解放后入了社，家里日子越过越红火，初级社时他们每人平均收入八十二元，高级社时则平均收入一百一十五元，两个孩子还上了中学，旧社会连想也不敢想的，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什么“高级社办糟了”，“高级社没有优越性了”，让这些谬论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见鬼去吧！

有的富裕中农说：农业社太不自由了。贫下中农说，不，只有农业社才有自由，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自由，这个自由使我们翻了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至于不自由，那只是你们想搞资本主义的人不自由了，这个不自由，实在是好得很！……

灯不拨不明，理不辩不清。贫下中农越辩越有劲，从田头到地头，从家庭院落到队部场院，到处是大辩论的战场。这真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攻势，它孤立了阶级敌人，击败了

资本主义势力,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五公党支部在领导贫下中农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产阶级思想时,始终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辩论的结果,不但坚定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而且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五公人民经过这场大辩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社员们更加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到一九五七年冬季生产建设中去,并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那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局面的到来。

第七章 人民公社好

革命闯开跃进路

一九五八年是一个大跃进的火红年代。全国人民在取得了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正如毛主席所赞扬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祖国大地热气腾腾，一派生机！

这年春天，五公又遇到了严重的旱灾，不仅麦苗开始枯萎，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大秋作物的春耕播种。村党支部和社委会及时提出了“靠人不靠天，浇水夺丰产”的口号，领导了这场抗旱斗争。广大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日夜奋斗在田间。为了抓紧时间抗旱，贫下中农自动把饭带到地里去吃；晚上，月亮已经升起很高了，大家还在用水桶担水、用脸盆端水，热火朝天地干着。五公贫下中农以冲天的干劲，战胜了干旱，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春播任务。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五公人民乘胜前进，为了保证对小麦的灌溉，春播工作刚刚结束，又开始投入突击挖渠的战斗。这一春，他们动上一万六千方，挖成一道五百五十米的主渠和长达一千六百米的支渠。社员们豪迈地说：“人多力量大，天不

下雨我不怕，擒来‘龙王’踩脚下，丰收喜讯传千家。”

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召开。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耿长锁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直接给五公人民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喜讯传开，五公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兴修水利，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但就在这大跃进的年代，五公村的社员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一村一社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了。

当时，五公人民感觉高级社最突出的矛盾有三个。一是一村一社的规模不适应水利建设需要，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五公村从组织起来以后，特别是并大社后，积极打井，发展了一些水利事业，但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完全靠井水来灌溉就感到供不应求了。这时通到饶阳县境内的石津干渠已经竣工，五公很想开渠引石津干渠的水浇地，可是挖渠要经过大曹庄的地，曹庄不同意，几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协议。五公的社员眼望着石津干渠的水哗哗地流走，着急地说：“有水使不上，真别扭，要是个生产单位，两句话就解决了，哪能费那么大的劲，还开不成。”二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业机具的增加，需要就地建立一些小型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这又是一村一社办不到的。当时五公村的农业机械日益增多，维修的任务越来越大，但自己力量单薄，不能办修理厂。机器有了毛病，必须送到石家庄或天津去修，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一去就得几个月，对生产影响很大。社员们对有机器使不上，很有意见，他们说：“这不是机器，这是在生气。”“要是咱自己办个修

理厂该多方便啊。”三是随着机耕面积的不断扩大，需要平整大片土地，这就需要解决村与村的“插花地”问题。过去由于土地私有制，五公地区各村的地互相交叉，高桥的地伸到五公村里，五公的地又伸到园子村、桑园，土地七零八落，严重地影响了机耕。而且由于有些地离村太远，施肥、运输、耕作都很不便，许多好地逐渐成了瘦地。成立高级社后，五公村曾和韩村商量，也只调换了二百亩，还有四百亩因两利关系解决不好，没有调换，影响了机耕面积的扩大。这种种矛盾表明，高级社这个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不论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等方面，都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五公人民不仅深切地感到了高级社的矛盾，而且开始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了。他们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和周围各村展开了社会主义生产大协作。一村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王桥村栽白薯缺劳力，五公村听说后马上派社员支援他们；五公村要深翻土地改造土壤，王桥村也来帮助。到处展现着新的面貌，体现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但是，各社之间开展的生产大协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级社这种组织形式所存在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并小社办大社，成为五公贫下中农也是全国贫下中农的普遍要求。

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就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完全

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五公村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具体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些英明论断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随着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发展形势，随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一种比高级社更好更高级的组织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很快就要出现。

欢庆公社成立

一九五八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热情赞扬了七里营人民的首创精神，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这声音象春雷，响彻祖国大地。八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给全国五亿农民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人民公社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五公贫下中农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要求乡党委赶快成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是五公人民难忘的日子。五公人民公社在这天诞生了。它由三十五个自然村共四个乡组成。五公村成为其中的一个生产大队，由原高级社的十个小队改变为三个生产队。大队建立了党总支，张端同志担任了总支书记，耿长锁同志当选为五公人民公社的社长、五公大队的队长和党总支委员。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比高级社的规模更大，它有利于战胜自然灾害，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更便于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公，就是说它比高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并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特别是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能够对工、农（包括林、牧、副、渔）、商、学、兵统一领导，因而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公社的建立有力地调动了农村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得到充分的发挥。五公公社成立不久，五公大队贫下中农便投入到秋收战斗中了。这是一个金色的秋天，由于五公人民的艰苦斗争，尽管在大旱之年，粮食亩产仍然达三百八十二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但贫下中农不满足于取得的成就，他们一鼓作气把村北几百年来形成的大片坟地全部平掉，扩大耕地面积六十亩，种上了小麦。

成立公社不久，五公村和邻村通过协商交换了插花地，解决了高级社时因插花地造成的种种矛盾。公社内部统一制定了兴修水利的规划，并调配劳动力互相支援，很快挖通了到石津干渠的渠道，对小麦实行了冬灌。土地连成大片后，为五公大队实现园田化创造了条件。冬天，五公人民掀起大修水利和深翻土地的群众运动，经过三个月的鏖战，打出机井两眼，锥井十三眼，开渠一千八百九十五米，深翻土地四千亩，初步实现了水利化、园田化。为了彻底根除风沙虫害多年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在公社党委的统一规划下，五公大队贫下中农在大道旁栽上了一排排小树，滹沱河旧道上造起了防风林带，大队建立了果木园，锁住了“黄龙”，征服了沙害。五公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公社的机器修配厂，伴随着人民公社的成长迅速发展起来，这为五公大队发展生产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可以修理好，节省了开支。厂里自制的三寸水泵，有力地支援了水利化建设的发展。

公社成立后，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五公大队和兄弟大队互相合作，自力更生建立了发电厂。从组织起来的那一天起，五公人民就憧憬着“机器轰鸣，电灯发亮”的美好前景。现在，发电厂建起来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电机一开动，清水哗哗流”的时代到来了，五公贫下中农多么高兴啊！当闸门一开，社办工厂的三寸水泵从井里抽出股股清水的时候；当电磨一开动，米、面流出来的时候；当万盏明灯第一次照亮了五公地区的时候，五公村社员们按捺不住那激动的心情，纷纷跑到街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三面红旗万岁！”这电灯，这电流，照亮了五公村的家农户户，烘暖了五公贫下中农的心——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心！

公社成立后，五公地区开办了公社医院、农业中学、电影队、广播站，方便了贫下中农群众。过去贫下中农得了病，最近也得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去医治，有的往往因为路远而使病人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现在一般治病不出社就可以了，同时由于医院加强防疫工作，社员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公社中学、广播站、电影队的建立，提高了贫下中农的文化生活水平，丰富了社员的文艺生活，五公村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春风杨柳万千条”。人民公社的建立，在人们眼前展示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拖拉机在广阔的原野轰

鸣，抽水机喷出了水龙；工、农、商、学、兵携手并进，农、林、牧、副、渔五业旺盛，……春天刚到，五公已是一片绿茵茵，人民公社的战鼓，催促春天提早到来。这一新生的组织刚刚诞生，就象东方初升的太阳一样，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显示了她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五公人民高兴地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搭起通天桥，步步来登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她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抗。人民公社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人民公社刚刚诞生不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老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便跳了出来，阴谋破坏人民公社。他们利用干部和群众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革命热情，别有用心地歪曲公社的性质，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达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当刘少奇一伙刮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吹到五公地区的时候，五公大队广大干部、社员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入秋后的一天，上面来了一位领导人，他看到五公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势很好，就要求五公在预报产量时“放五颗卫星”，说什么：“你们是红旗单位，应该带个头。”耿长锁听后回答说：“今年的产量已成定局，放‘高产卫星’，只能是放

空炮,别说五颗,就是一颗也不能放,欺骗国家欺骗人民的头我们不能带!”结果,五公受到这个领导人的批评,从此以后,过去经常见报的五公大队也不见报了。党总支个别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不免有些嘀咕,耿长锁坚定地对这些同志说:“登报不登报问题不大,问题是要说真话,办实事,对党对人民负责。不登报我们不也照样干社会主义吗?”过后,有一个“好心”的记者为了使五公重新见报,想把五公的粮食亩产说得高一些,耿长锁听说后,马上追到记者那儿,说:“我们共产党员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决不能靠说假话骗取荣誉。”坚决要求记者把产量数字更正过来。耿长锁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行动,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五公大队党总支的同志。秋后,他们不顾上边某些领导人的批评,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生产跃进计划,研究了增产措施。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取得了公社化后第一个大丰收,粮食亩产平均达四百三十斤,上了《纲要》。这一年他们向国家交售十八万斤粮食,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年还多贡献十万斤。

当时,由于刘少奇刮起的“共产风”的影响,五公公社个别领导同志想要把大队的副业组织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并用向各大队抽调公共积累和物资牲畜的办法,加强公社所有的集体经济。这样无偿调用的结果,不仅削弱了队有经济,而且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五公大队贫下中农对刘少奇刮起的“共产风”很反感,他们气愤地说:“发展公社集体经济是应该的,但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不能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加强

公社经济。”他们以实际行动抵制了“共产风”。公社要无偿调用第二生产队的牲口，第二生产队干部、社员质问公社的某些领导人说：“党要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你们把我们的牲口调出去，我们拿什么发展生产？”坚决顶了回去。五公人民就是这样勇敢地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使刚刚诞生的人民公社健康、茁壮地成长。

毛主席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针对刘少奇一伙刮起的“共产风”，《决议》明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决议》还严正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那套弄虚作假的剥削阶级作风，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不利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更明确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党的决议，毛主席的指示，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一伙，为农村广大干部、社员抵制“共产风”和“浮夸风”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五公党总支带领广大党员反复学习讨论了党中央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一年，他们积极协助公社领导，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所规定的方

针、政策,对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当五公人民排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扬帆破浪乘胜前进的时候,彭德怀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又跳了出来,疯狂攻击三面红旗。上边一阵风,下边一层浪。五公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在背后嘟囔说:“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单干。”五公贫下中农听到这些奇谈怪论,肺都要气炸了。他们总结了高举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用铁的事实,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迎头痛击,保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贫下中农坚定地说:“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为我们搭起的金桥,我们走定了,谁要反对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一九五九年八月,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领导全党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的罪恶阴谋,保卫了社会主义事业。十二月,五公大队党总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大反右倾保守思想,掀起又一个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潮。春节刚过,根据公社的规划,五公人民展开了挖渠平地运动,使田园达到渠网化,当年八百亩小麦先后浇了四水,亩产平均达430斤。

斗争取得了胜利,胜利紧接着斗争。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我国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更加上苏修叛徒集团趁火打劫,阴谋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刘少奇一伙代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社会上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乘机跳了出来,配合国际上反华反共的反革命逆流,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叫嚷

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等等。

一九六一年秋收前夕，在刘少奇直接控制下，原河北省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地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在会上，有人竭力鼓吹“三自一包”的好处，还提出一个社员口粮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的“新政策”。耿长锁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听到这些奇谈怪论，脑子里不禁出现了一个大问号。他想：口粮“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那劳力多的户，就可以分一大堆粮食吃不了，而人多劳力少的分的粮食不够吃；分粮多的可以高价私卖粮食，分粮少的没有办法还得用高价买粮食，久而久之不就又会造成两极分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吗？这法怎么行呢。多少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耿长锁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凡事用两把尺子衡量，事就不会办错，路就不会走歪。一是毛主席的教导，一是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符合贫下中农根本利益的事，他们就坚决地做；不符合的，不管是谁，不管他官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他都坚决抵制，坚决斗争。“三自一包”实质上是走单干的回头路，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会造成两极分化，不利于贫下中农之间的团结，不符合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耿长锁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同意实行这样的“新政策”。当主持会议的人要人们发言时，耿长锁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霍地站起来说：“搞‘三自一包’，不是又要单干了？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不又闹个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了吗？我们不同意这样搞。”他根据五公村多年来分配粮食的经验，主张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相结

合”的分配方法。

一个人民公社的负责人竟敢当面反驳省里领导人的意见，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掌握会议的那个领导人不但根本听不进耿长锁的意见，而且当天下午，就通知耿长锁，不要他参加座谈会，第三天又通知他回五公村。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耿长锁回村不几天，上边就派了工作组到五公，要在五公试行“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法”。工作组一进村，就给耿长锁等同志来了个下马威，说：“这是上级的决议，你们是红旗单位，无论如何要坚决执行。”耿长锁和张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同意实行这种分配方法。他们说：“红旗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旗，决不是走歪道邪路的红旗，这个办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不执行。”为了发动群众和这条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党总支的同志和社员们在一起算了三天三夜账，按工作组的办法分配粮食，五公村劳力最多的户每人每天平均分粮六、七斤，劳力最少的户则只分五、六两。这账一算，就使广大贫下中农清楚地认识到，“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实质上就是走两极分化的道路，“有粮的满囤流，没粮的到处走”。所以这时尽管工作组整天召集社员大会，使劲宣传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好处，但是五公人民不信他们这一套。有一次，他们召开社员大会，又搬出他们那一套想说服群众。谁知，他们的话音刚落，社员们的嚷声就把屋子抬起来了。有的说：“这法太狠，人多劳少的怎么过呀？”有的说：“这么办，几年后有的就变成财主，有的又拉起枣枝棍了。”劳力少的不赞成，劳力多的也反对。二队贫农社员、共产党员李敬华和黄根瑞说：“我们劳力多，粮食完全按劳

动工分分配，我们比谁都分得多，可我就是不赞成这个法儿。咱组织起来奔社会主义，是要人人有饭吃，大家都过好日子，可不是让少数人发财，多数人遭殃。要是有吃着的，有看着的，那还是什么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看五公党总支和贫下中农这坚决劲儿，感到无计可施了，只好作罢。五公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口粮分配办法，采用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工分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法。

一九六二年春天，由于刘少奇“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五公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又开始抬头了。他们煽起一股“单干”的邪风，使五公村一些富裕中农也开始津津乐道什么“责任田”、“保命田”以及“猪饲料田”了。耿长锁同志和党总支领导贫下中农反复学习讨论了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们说：“咱们改变穷村，靠社会主义，把土地下放，搞责任田，搞单干，这是一条黑咕隆咚的回头路，这条道咱不能走，要堵！”

一天，有一个富裕中农找到党总支书记张端探听风声问道：“咱们什么时候分地啊？”张端毫不犹豫地答道：“有人民公社在，有我们共产党员在，想分集体的地，搞单干，只能是痴心妄想！”有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社员被这股“单干风”吹晕了头脑，又开始走乡串户干起零活来，党总支发现后，及时地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使这些社员认识了错误，返回生产队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单干的路被堵死了，自发势力又从别处冒了头。在刘少奇一伙“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谬论的影响下，五公地区的自由市场开放后，五公村一些富裕中农，丢下集体生产不顾，整

日在自由市场上，或搞小猪买卖，或套购国家的物资卖高价。有一次，队里派一个社员去石家庄买电动机，那个社员买好电动机后，见石家庄市场上的碱面价钱便宜，有利可图，就想买些回来转手倒卖，并且写信问耿长锁要不要买。目睹自由市场泛滥，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事实，耿长锁几天几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旧社会的苦水又涌上了心头。他想，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这样下去，我们贫下中农不就又要吃一遍苦吗？想到这里，他下定决心要发动群众刹住这股妖风。他和党总支的同志连拍两封电报召回了石家庄购买电动机的那个社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耿长锁说：“现在咱们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不能弃农经商，更不能趁灾年跑自由市场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苦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绝不能走那条路！”

在党总支的领导下，五公大队广大社员开展了一次反走回头路的大讨论。经过讨论，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认识到，这些年来，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社员生活日益提高，就是依靠党，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是贫下中农的光明大道。而单干则是一条贫穷的道路，家破人亡的道路。这条路决不能走。几个经常跑自由市场的社员也提高了认识，表示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巩固集体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少奇一伙妄图破坏人民公社，扭转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五公村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五公人民迎风

雨战恶浪，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人民公社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党的基本路线指航向

正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时刻，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这条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如同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航程。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传到五公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学习毛主席指示和公报的热潮中。从田间地头到家庭院落，到处是认真学习、热烈讨论的生动场面，大家联系当前阶级斗争事实，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始终存在激烈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五公人民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向猖狂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发起了主动进攻。

这场进攻战，首先打击了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当国内外阶级敌人掀起反华反共的逆流，台湾蒋帮叫嚷窜犯大陆的时候，五公村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也兴风作浪，进行反攻倒算活动。地主分子李茂修利令智昏。他竟敢向贫下中农索要土改时被分的房子，并且向贫下中农施放糖衣炮弹，用小恩小惠腐蚀拉拢青年。反革命分子李金抓几次给社干部送菜，妄图拉干部下水，党总支察觉了他们的罪恶活动，立刻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刹住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广大贫下中农努力用党的基本路线来分析观察一切事物。第二生产队的一个富农分子在人前装出一付“老实”相，让做啥就做啥，暗地里却进行破坏活动。大家没有上他的当，对他进行了严密监视。一天，在队里劳动时，他故意锄掉棉花苗，留下青草，破坏生产，社员们及时发现了，当场抓住他，对他进行了批斗。

打击阶级敌人的斗争步步深入，极少数暗藏的坏人也被五公人民揪出来了。第三生产队有一个叫徐继昌的人，这个人平时好逸恶劳，还经常盗窃队里的东西。徐继昌的行动引起了大家的警惕。贫下中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他的表现，并到他原来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县供销社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流氓坏分子，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回乡生产。回到队里后，他向组织隐瞒了自己的肮脏历史。事情真相大白，广大社员十分气愤，马上对他进行了批斗，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对他实行了监督改造。

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实际斗争中，广大贫下中农更清楚地听见了阶级敌人咬牙切齿仇恨社会主义的声音，他们更加勇猛地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中国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表现，广大贫下中农在反复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后，站在新的高度，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倾向的危害性。第三生产队有一段时间滋长了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为了赚钱，在生产队开了一个染房，派人到天津购买颜料，结果被地下奸商所骗，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由于方向错了，路线偏了，严重地影响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这一沉痛的教训，使广大贫下中农认识到：有些集体生产单位，打着集体的旗号，搞资本主义活动，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必须同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群众的讨论，为集体副业生产做出了四条规定：第一：不搞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副业；第二：不搞商业性质的副业；第三：不搞不能就地取材的副业；第四：不搞同国家争夺原料的副业。这四条规定批判了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堵住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农业

生产。

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性，不仅在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还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五公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不断打退地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刑满释放分子李富增和李树文为了达到他们变天复辟的目的，到处钻空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坏戏，讲黄色小说，宣扬孔孟之道，散布封资修的腐朽思想，腐蚀群众，毒害青年，有的青年中了毒，讲吃穿，摆阔气，不安心集体生产劳动。

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激起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无比义愤。党总支领导贫下中农和青年团对这些坏人进行了斗争。他们把青年们组织起来，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建立了宣传组、创作组、会计组、美术组、通讯组、俱乐部等八个组织。党总支和团支部领导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基本路线。耿长锁同志还亲自给青年们讲了本村地主李化南在旧社会压迫人民的罪行，讲了解放前五公贫下中农给地主当牛做马的悲惨生活。血泪的控诉，激起了青年们的万丈怒火。团支部领导青年们进行了访贫问苦，编写村史、家史，使青年一代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有一个女青年把她家在旧社会的破被子保存下来，要永远不忘过去的苦难。

一天，在下地的路上，地主分子李茂修跟在女青年们的背后哼唱小调，宣扬“早恋早婚”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青年们转过身来，对他进行了批判。刚从城市工厂回乡务农的徐秀稳指着他的鼻子说：“不许你腐蚀青年，我们有革命的理想和志愿，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青年们严肃的批判

吓得李茂修如霜打了的狗尾巴草，搭拉了脑袋，连连认错。

资产阶级在那里进攻，五公人民就在那里反击。坏人讲旧书，青年们针锋相对和他们斗争。他们编写革命诗歌，大讲革命故事，团支部还把青年组织起来，挑灯夜战两个晚上，在村外推土垒起了俱乐部的午台，把村史、家史编成了文艺节目宣传演出，深入进行阶级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觉悟。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经过一场严峻的斗争，五公大队广大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热爱集体，以社为家蔚然成风；老队长徐庄热爱集体多年如一日；李多林大公无私维护集体利益，人称“铁大人”；卢墨林、李砚田保持老四户的创业精神，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任劳任怨。青年们在革命和生产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五保户的墙头塌了，有人自动的给垒好；秋天下雨了，社员们揭掉自己的炕席，争先恐后地往场里跑，保护集体的粮食。五公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正气深入人心。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光照耀下，五公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带着这个胜利，五公人民迎来了他们“组织起来”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河北省委和省人委在五公召开了庆祝大会。英雄的五公人民和来自全省各地的领导同志、劳动模范欢聚一堂，共庆五公人民集体化二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会场内外，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老社长耿长锁同志主持庆祝大会，并致开幕词。省委领导人和各地的代表都发了言，《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七日为祝贺五公人民集体化二十周年发表

了《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坚持战斗二十年》的社论，表彰了五公人民紧跟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高度赞扬了五公人民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社论深刻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二十年前五公四户农民开始走的道路，也正是后来全国农民所走的道路。”“五公村是我国农民英勇顽强进行革命的一个典型，也是我国农民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典型。五公村二十年的斗争历史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组织起来的革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在这欢腾的时刻，五公人民认真总结了二十年来走集体化道路的战斗历程。五公人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历史，是一部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历史。这部历史深刻地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回顾这战斗的历程，五公贫下中农个个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决心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高举三面红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乘胜前进。

自力更生结硕果

人民公社化以后，五公大队的集体经济有了更大发展，收入多了，家底厚了。但是五公干部和群众仍然自觉坚持了“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那还是在公社成立不久，有些人看到五公大队是个先进队，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主张在村口修一个大牌坊，说这么搞有气魄，象样子。耿长锁和党总支书记张端说：“什么是气魄？”

鼓足干劲，多打粮食，支援革命才是气魄。花那么多钱修牌坊不是气魄，这是浪费！”坚决阻止了这种做法。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级给五公拨来两部汽车，个别社员知道队里有几万元的积累，主张买下作为向“组织起来”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献礼。他们说：“人家办社晚的队都有汽车，有什么事开出去真棒！咱们办社二十年了，连部汽车也舍不得买，真显得穷气。”听到这种议论，党总支立即组织社员讨论了“与兄弟队比什么？是比生产还是比阔气？”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我们和兄弟队只能比觉悟，比干劲，比生产，比对国家的贡献，决不能比阔气。汽车不是不可以买，但一定要为发展生产买，决不能为显示阔气买；如果比阔气，比来比去就会比掉勤俭办社的革命精神。大家都赞成汽车不是现在急需，可以不买，把钱用来买化肥，发展农业生产。

斗争的实践使五公大队党总支深刻认识到，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革命精神是贫下中农的创业之根，立业之本，生产越发展，条件越好，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革命精神越要保持牢。他们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公社化以来，五公大队每年的非生产性开支没有超过百分之零点三。第一生产队的会计几年来一直使用化肥袋作办公纸，每年可以为生产队节省五、六十元。大队办公室还是土改时没收富农的几间旧房子，墙壁裂了好几道缝，干部们自己动手用铁丝、木棍支撑着。屋里的办公用具，除了自制的几张没有上漆的板凳和桌子外，唯一象样的家俱是一个孤老户留下的旧式橱，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拿它当文件橱用。社员们多次向党总支建议，要大队盖幢新办公室，他们一推再推，说：

“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咱不能站在五公看五公，要想到世界上还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想着整个阶级，穷了可以变富；忘了整个阶级，富了可以变穷。咱五公大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传统不能丢啊！”

五公贫下中农常说：“咱贫下中农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没有这个精神，就不能创社会主义大业。吃了好饭，不能忘掉讨饭篮；集体经济发展了，不能甩掉旧扁担，三把大镢创业的革命精神我们永远不能丢。”有一个社员，解放前的生活苦似黄连，解放后，特别是成立公社以后，生活比蜜还要甜。一九五九年，他全家分了几千斤粮食、几百元钱，这时，他就开始变了，讲吃讲穿，不愿找活干，一句话，就是不愿艰苦奋斗了。五公贫下中农看他变成这个样子，非常痛心。党支部副书记卢玉臣、生产队长徐树宽以及和他一起从旧社会过来的穷哥们纷纷找上门来，和他一起忆苦思甜，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忘本行为，决心痛改前非。耿长锁还抓住这件事，在社员中开展了“忆苦思甜不忘本，艰苦奋斗永向前”的农民自我教育活动，进一步激发了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苦干，克勤克俭，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五公人民在创社会主义大业时，不仅是勤俭办社、艰苦奋斗的样板，而且是自力更生的突出榜样。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由于石津干渠改道，五公大队用水发生了困难，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他们准备打锥机井。上级党委知道后，派了两个同志带了三十万元钱来支援他们。五公大队党总支和贫下中农很感激上级党委对他们的关心，

但又想到，搞建设应该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决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支援，他们执意退回这笔无代价的拨款。派来的两个同志说：“五公是一个先进单位，在这儿搞一个高标准的水利化方田，抓典型示范一下，叫别人好参观参观。”耿长锁一听这话不对味，接着他的话茬就说：“要这么说，俺们更应该退回拨款啦，咱们拿国家的钱打十几眼铁管井，然后叫人家参观，人家心里怎么服气？要是本着自力更生的劲头和勤俭办事业的原则干好了，人家才能服气呢！”他们坚决谢绝了上级的物质支援，坚持自力更生，几年之间打了几十眼机井，建成了一些高标准的水利化方田。

一九六三年，五公大队遭到了涝灾，滹沱大雨直泻而下，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远远超过了正常年份全年的降雨量，雨大水猛，再加上滹沱河上游洪水暴发，洪水雨水汇流成河，吞没了眼看要上场的三千多亩庄稼。在这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五公人民没有垂头丧气，在党总支的领导下，他们和洪水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保住了全村集体和社员的财产及生命安全。

五公受灾后，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上级给五公拨来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救济款和救灾物资，党总支带领社员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他们又一次谢绝了国家的拨款，并满怀激情地提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同舟共济，支援兄弟队”的口号。他们白天冒烈日，夜晚披星星，排出了地里的积水，扶起了冲倒的庄稼，修好了冲平的田埂，并通过加强灾后的作物管理，使粮食亩产达到四百一十斤。在

这大灾之年，五公大队不仅保证了社员的口粮和种子、饲料，而且还主动完成了全年八万五千斤粮食的征购任务。此外，还拿出五万斤蔬菜、三万五千斤粮食、上万斤饲草，支援了重灾的兄弟队。

五公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样，不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灾害，总是坚持一个原则：只能给国家作贡献，不能给国家添麻烦。贫下中农说得好：“自己能走路，为什么要别人来扶呢？我们能够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灾害，就决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精神，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对国家作出新贡献。一九六〇年后三年，在连续遭受水、旱、虫灾的情况下，他们仍向国家贡献十六万斤粮食、十一万斤棉花。

在四清运动中

一九六三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进行，打破了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他们再一次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疯狂地反扑。一九六四年，他们背着毛主席精心炮制了一个黑样板——桃园经验，并盗用中央的名义，向全国推广。随后，他们又按照这个黑样板，制定了一个所谓《后十条》，肆意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质，极力回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胡说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用一

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这场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地反映在五公大队。

一九六四年十月份，四清工作组来到五公大队。这个工作组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刘少奇“假四清、真复辟”的反动路线。按照“桃园经验”，他们进村后，立即宣布五公党总支是“灰色支部”，把党总支一脚踢开，并把五公所有的干部都看成是“四不清干部”，当作斗争对象。为“搞清”干部们的问题，他们就象进入“敌占区”一样，私查暗访，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扬言“有枣没枣打三杆”，“过了筛子再过箩”。他们把干部关在房子里，气势汹汹地说：“非要将你们这块铁疙瘩砸开不可。”强迫干部们互相揭发，交待问题。

这又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五公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知道工作组整的这些干部，有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多年的老党员，有的是合作化时的新骨干，他们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工作中克己奉公，任劳任怨，时刻想着贫下中农的利益，和贫下中农血肉相连，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这只能采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对这些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实行无情打击，是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因而他们坚决反对工作组这样整干部。当工作组命令民兵把干部看管起来时，民兵们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的枪是对付敌人的，这些干部大多数是我们的好带头人，不是阶级敌人，我们不能执行你的命令！”当工作组硬逼着贫下中农揭发干部的

问题时，五公贫下中农们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干部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事处处为集体，我们没有什么事可揭！”

有一天，工作组在开社员大会时，又气急败坏地大骂五公大队党总支，叫嚷五公不是红旗单位，是一个“四不清”的坏典型，社员们越听越气，他们说：“是不是红旗单位，清不清，调查调查就知道了。”大家愤愤地离开了会场，冲散了工作组召开的大会。

在这激烈的斗争中，五公大队的干部们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他们不怕压，不信邪，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在社员面前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一方面又不计较个人得失，带领群众和工作组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

有一次，工作组要干部们写检查，不让干部们回家吃饭，总支书记张端挺身而出，同工作组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厉声质问工作组：“为人民服务有缺点错误可以改，不让吃饭这是哪家子的政策？”问得工作组的人无言可对。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恼羞成怒，他们借口老四户之一的李砚田有问题，要求调民兵将他绑押起来，张端听说后，又一次站出来，和民兵营的同志们一起制止了工作组的无理行动。

不管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怎么折腾，也砸不开五公这个“铁疙瘩”，找不到整垮五公党总支的把柄。工作组只好不择手段，利用挑拨干群关系和“物质刺激”的办法引诱社员给干部“提意见”、“揭发问题”，说什么“谁揭出赃物来，东西就归谁”。他们还借口清理工分，企图通过扣除工分的手段，进一步打击、迫害干部。徐树宽虽说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她担任着生产副队长，长年在地里劳动，工分数较高，工作组既不调查，也

不研究，就武断地说：“徐树宽是个妇女，怎么能挣三百多个工？”非要扣掉二百个分不可。接着，他们又搞干部退赔。本来，五公的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但工作组不顾这一客观事实，硬要干部退赔赃物。把李砚田和魏书娟借队里的几十斤粮食说成是贪污的，非要他们把粮食背到退赔展览会上去。工作组的一意孤行，激起了贫下中农的无比愤慨，他们找到工作组的人，当场和他辩论起来：“我们的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泥里来水里去，谁个看不到？你们为什么要扣他们的工分？”“李砚田的粮食是借的，这是俺们亲眼见的，你们为什么不调查研究，就要他退赔？”在群众义正词严的责问下，工作组不得已收回了扣工分、搞退赔的计划。

正在大家与修正主义路线酣战的时刻，老社长耿长锁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从毛主席身边回来了。他给五公人民带来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鼓励。耿长锁对大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是错误路线就要顶，要斗！你们顶得好，斗得对！”在耿长锁的带领下，五公人民更加充满信心，和错误路线展开了更坚决的斗争。

东风劲吹驱腐恶，五公人民笑颜开。正在刘少奇一伙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刻，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光辉的《二十三条》，宣告了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破产。毛主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二十三条》传到了五公，就似一股暖流，流进了五公人民的心坎，“毛主席为我们撑腰了！”贫下中农奔走相告，欢喜异常。它给五公人民带来了战斗的武器，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多

少受过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心潮澎湃，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流下了晶莹的泪花：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有了您，我们前进有方向，有了您的革命路线，革命征途不迷航！

在《二十三条》的指引下，在新的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五公人民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狠狠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五公大队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这场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五公大队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气更浓了，广大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员群众肩并肩地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后，曾具体地提出了学习大寨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周总理的指示，使五公贫下中农进一步看清了前进的方向，找到了光辉的榜样。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会议还没有开完，耿长锁同志找到了陈永贵同志，虚心地向大寨人学习好经验，决心带领五公人民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年冬天，五公大队党总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抗冰雪，斗严寒，战天斗地，挖了四十条排水沟，更好地平整了土地。他们还自力更生，上法上马，苦战一个冬春，打成了五眼新机井，并修好旧井，使五公园

田化、水利化程度又提高了一步。这年，养猪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学大寨首战告捷。第二年秋后，五公的粮食亩产由原来的四百斤左右一跃为七百四十斤，皮棉亩产由四十多斤猛增为九十一斤。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也由一九六四年的五万斤，一下子增加到二十万斤。

经过斗争风浪考验的五公人民深知：不但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他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准备迎接前进道路上更严峻的考验。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奏凯歌

伟大的革命 战斗的洗礼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开始了。

经历过斗争风险的人最知道斗争的幸福，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战斗过二十几个春秋的五公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满怀革命豪情，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那疾风暴雨的日子里，五公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战斗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经受了更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早在一九六五年冬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的时候，五公人民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了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党总支领导全村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领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向全党和

全国人民发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明确规定了任务、方针和政策。五公人民在党总支的带领下，立即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的热潮。

耿长锁和党总支其他同志学习得更深入，理解得更深刻。他们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运动的任务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开火，说明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个革命干部，应该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耿长锁对党总支的同志们说：“咱们为党为人民干了几十年工作，成绩当然有，缺点也一定会有。让社员群众敞开心胸提一提，提得对的坚决改正，提得不对引起注意，这样大有好处。”他叫女儿代笔第一个写出大字报，引火烧身。干部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和社员一起学习，促膝谈心，征求群众的意见。五公贫下中农很快行动起来，他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帜，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贫下中农子女组织了红卫兵，从地主分子李茂修家查出了变天账，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了他。贫下中农建立了群众专政小组，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些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五公迅猛地发展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五公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但是，“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

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一九六七年初，正当五公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林彪伙同“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起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他们一小撮。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受蒙蔽的人对耿长锁同志，对五公这面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旗也进行了冲击。他们大肆叫嚷：“五公这面红旗是假的，耿长锁是假劳模”，扬言“非把这面旗拔掉不可”。春节那天，他们在耿长锁和党总支其他同志家贴了白对联，封了他们的门，并把耿长锁同志叫到三队队部，要他作检查，承认自己是假劳模。五公这面红旗是真的还是假的，耿长锁同志是真劳模还是假劳模，五公贫下中农最清楚。这天虽然寒风凛冽，但是寒风吹不冷五公贫下中农的热心窝。他们纷纷从家里跑到三队队部，和这伙人展开了辩论。贫下中农从耿长锁的家史、从他在日寇的铡刀下面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讲起，讲到“土地合伙组”三把大镢创业，讲到收留四个孤儿，带领五公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讲到顶住砍社和“三白一包”妖风的斗争……。那一件件往事，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斗争场面，又真真切切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社员们激愤了。他们大声质问那一伙人：“俺们五公贫下中农在老社长耿长锁的带领下，最早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实打实地跟毛主席干革命，干社会主义，你们为什么说俺们是假红旗？为什么说耿长锁是‘假劳模’？”耿长锁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坚强有力地說：“说我们是假红旗，要摆出事实来。是红旗，拔是拔不掉的，是黑旗，再拔，风一吹就倒了。”一席话，说的那伙人哑口无言。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理屈词穷，瞠目结舌，连忙收起给耿长

锁整的假材料，灰溜溜地走了。

斗争在继续着。一九六七年四月，社会上又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妖风。五公大队个别不明真相、私心较重的人，要求生产队把留下的粮食和油分给社员，还怒气冲冲地质问耿长锁为什么不给社员分好粮食，耿长锁和党总支全体同志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支持下，站得直，立得稳，他们正气凛然回答：“把好粮食交给国家，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本份，翻了身就可以忘本吗？”一些人跑到一队会计那儿要钥匙准备动手分粮食，一队队长李砚田、魏书娟及时赶到，严正地对他们说：“这集体留下的粮食，是为发展集体经济，一粒一颗都不能分！”广大群众也闻讯赶到队部和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要求分粮的人在众目怒视之下，低着脑袋走了。五公人民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了又一回合的胜利。

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使五公大队贫下中农进一步认清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真面目。十几年来，五公贫下中农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党内总有人反对，或者逼迫他们解散合作社，或者鼓吹“三自一包”企图拉他们走回头路，这个总根子在哪里？过去大伙都弄不明白，找不到答案。现在答案十分明确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就是破坏合作化运动，反对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根子。耿长锁接连写了几份材料寄给中央，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妄图解散合作社的罪行。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展开了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大字报一张接一张，象一颗颗炮弹直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会接连不断，批判文章、批判专栏和漫画贴满了墙。会上、会下、炕头、地头，到处摆下了

大批判的战场。大人小孩齐参战，对刘少奇一伙进行了愤怒的声讨，有力的批判。群众说：“刘少奇一伙反对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贩卖‘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黑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让我们走回头路，复辟资本主义，狼子野心真是狠毒透顶，我们决不上他的当！”

在大批判中，一九六八年五月，五公人民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耿长锁同志被五公人民推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战斗，抓革命促生产，五公大队革命、生产生机勃勃，热气腾腾。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耿长锁同志光荣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上，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号召，激励着五公人民继续前进。不久，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思想，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满腔热情地帮助党组织继续整顿，吐故纳新，在整党的基础上，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举老、中、青三结合的党总支。新的党总支认真落实了党的九大路线，带领五公人民，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开展了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领导民兵组织贯彻了“三落实”。五公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向革命的新胜利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阔步前进的时候，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继刘少奇反党集团垮台后，又暗地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九大”结束不久，他们刮起了一阵否定大寨的妖风，妄图破坏和干扰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时，五公听到了一些奇谈怪论，什么“千条线，万条线，全党抓，全民干，一切纳入‘四好’干。”什么“‘四好’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辩证的统一’，搞好了‘四好’，学大寨运动也就带起来了。”等等。受这些舆论的影响，一些人看五公大队党总支对搞“四好”不那么热心，就质问大队党总支：“你们不搞‘四好’，要把五公引向何处？”五公大队党总支和广大党员对这些奇谈怪论提出怀疑。他们想：“‘四好’运动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精神？”“一切纳入‘四好’干，那我们党的工作往哪儿摆？”“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寨的道路是我们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为什么农村不学大寨而要搞‘四好’运动？”带着这些问题，一个总支委员到大寨去请教。大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在错误潮流面前坚持原则，敢冲敢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他和总支其他同志决心向大寨人学习，坚持执行正确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九七〇年八月，党总支副书记张朝可同志参加了北方农业会议，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农业学大寨”的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五公人民。但是，张朝可同志回来后，会议精神却由于上级某个领导部门在五公搞“四好”评比活动贯彻不下去。张朝可急了，找到耿长锁问道：“老耿，这怎么回事？社员们都让评

比活动搞晕了，咱这学大寨会议精神还能不能传达贯彻？”耿长锁胸有成竹，说：“这次北方农业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会进一步促进我们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传达贯彻的。”党总支以反错误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向贫下中农传达了北方农业会议的精神，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五公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建立了政治夜校，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领导班子开门整风，反骄破满，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七一年粮食产量由七〇年的九百二十五斤一跃上升到一千〇五斤，闯过了千斤关。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结果自取灭亡。消息传到五公，广大贫下中农无不拍手称快。对于林彪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阴谋，贫下中农表示极大愤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五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七十一岁的老社长耿长锁同志找到当年最早“组织起来”的李砚田、卢墨林、乔万象成立了“老四户”批判组，用他们紧跟毛主席，翻身得解放，一步一层楼的切身经历，狠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广大贫下中农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靶子，抓住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说：“林彪一伙极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头可断，血可流，回头路

不能走，二遍苦决不受。谁要拉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就和他斗争到底。”

广大贫下中农越批，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得越清楚。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农业学大寨的方向，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党总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干群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添置了四十五台柴油机，实现了机电双配套，打响了一九七二年战胜旱灾夺丰收的战斗。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宣告了林彪极右路线的彻底破产，五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战役的伟大胜利。带着这个胜利，五公人民迎来了他们“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三十周年，迎来了上层建筑领域中又一场更深刻的革命。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五公人民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向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鼓吹的孔孟之道展开了批判。他们联系本大队地富分子用地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孔孟之道腐蚀贫下中农的罪恶活动，深刻认识到：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是林彪及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是复辟倒退之道，同时又是毒害人民思想的骗人之道、害人之道。通过对孔孟之道反动实质的深刻批判，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党总支具体制订了措施，大力扶植新生事物，使五公大队新生事物似烂漫的山花，绚丽夺目，茁壮成长。

一个朝气蓬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路线对不对，领导是关键。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五公——这支社会主义之花，更加绚丽鲜艳。粮食亩产过了千，向国家贡献过百万，成为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其关键问题就在于五公大队党总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他们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自觉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建设领导班子，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按照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建立的五公大队党总支，由十三名委员组成，老年干部二名，中年干部七名，青年干部四名。几年来，党总支十分重视培养青年干部，同时又充分发挥老年干部和中年干部的优点和特长，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出现了以老带新，新老结合，团结战斗，共同前进的生动局面。文化大革命以来，五公大队培养了三十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青年加入党组织，有十八名青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民兵营专职教导员是个青年干部，一次参加民兵会议回来后，觉得任务重时间紧，没有向党总支商量，自作主张在当天晚上召开了排长以上的民兵干部会议。老干部看到青年一代热情高、干劲大，打心眼里高兴；可青年干部工作经验不足，也正需要去帮助。老社长耿长锁和总支书记张端找到他，首先肯定了他对工作满腔热忱的一面，又诚恳地指出了他自作主张，违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缺点和危害，并且提出了殷切的希

望。这个青年干部深受教育。在老年干部的帮助下，他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总支的领导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民兵工作越作越好。

一九七四年，党总支书记张端同志因病不能工作了，副书记乔利广代理了书记职务。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各项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受到社员们的热情赞扬。一九七五年，杨同同志担任了党总支书记，乔利广还是副书记，他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没当书记闹情绪，反而因杨同是一个较年青的干部，给杨同以热情的支持。社员们看到新老干部团结一致，十分高兴地说：“咱们的老干部有经验，新干部朝气蓬勃，他们团结一致，咱们的步子一定会越迈越大。”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五公大队党总支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前，第三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一直居全村第一位，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却跌了下来。党总支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派了一名总支委员充实了三队领导班子，并帮助他们从路线上、方向上找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原来，第三生产队某些干部存在着重副轻农的思想，着眼抓钱，忽视了路线，使资本主义势力得以抬头，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党总支对存在重副轻农思想的干部进行了批评帮助，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三队的革命生产很快出现了新的形势，一九七五年粮食产量又超过了其它生产队。

一九七五年有一段时间，村里个别人请吃请喝，新担任书记的杨同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股不正之风。他和总支其他同志一起调查研究，原来是一个富农子弟为了在盖房时多占些地方，采用请客吃喝的手段，拉拢大队主管盖房的三个回

志，而这三个同志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稀里糊涂上了当。事情弄清楚后，杨同将那个富农子弟找来，指出他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腐蚀干部的严重性，同时又对主管盖房的三个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刹住了“请吃风”。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增加党内团结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总支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了搞好一班人的团结，五公大队党总支规定：凡有意见、分歧，都直截了当的摆在桌面上讲，不允许转弯抹角的讲；在会上讲，不在会下讲；党组织未作决议以前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表，也可以争论，在党组织作出决议后，就要认真执行。大队支部成员自觉执行这一项规定，有分歧就争论，有矛盾就斗争，无论是书记，还是委员，谁说的办法符合党的路线政策，切合实际，就照谁的办。一次支委会上，党总支副书记乔利广和老社长耿长锁发生了争执。事后有人劝乔利广说：“老耿那么大岁数了，要尊重他，不要和他争来争去的。”耿长锁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立刻找到那个同志说：“开会我一人说，那不成了一言堂？在总支会上咱们都是同志，有不同意见就要争。灯不拨不亮，理不争不明。我们尊重的是正确意见，可不能有话憋在肚里不说。”还有一次，耿长锁同志从县里开会回来，听到有的干部说：“天气冷了，地已上冻，冬前耕地任务完不成。”下午，他亲自到地里看了看，用镐挖了挖。在第二天召开支委会，耿长锁提出，地可以耕，上冻前要耕完。可是有的干部仍然认为耕不了，主张明春再耕。两种意见争执不休，这时老耿同志并没有硬要大家服从自己的意见，只提出要大家到地里去看看。到了地里一看，那些坚持

不能耕的同志都同意了耿长锁的意见。原来他们是上午到地里看的，尽是冻坷垃；现在看到太阳一晒，冻土化了，下午可以耕。支委们在调查研究中统一了认识，从而作出正确的决议，在入冬前完成了耕地任务。

五公大队党总支成员坚持和社员实行三同，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们吃苦在群众前头，享受在群众后头，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有一次，耿长锁从外队检查生产回来，路过队里的瓜地，看瓜的小青年摘了一颗“老头乐”甜瓜给他吃，他问小青年：“是不是让每个社员都来吃一个，乐一乐呢？”青年说：“那可不行。”耿长锁说：“社员不行，我怎么能行呢？难道我比社员高一节？”他接着说：“这是集体的财产，社员没有随便吃的权力，干部也没有这个权力。干部和群众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干部拥有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如果当了干部，就闹特殊，他就不配当这个干部，不配为贫下中农掌权。”他的这种身教言传，使那个青年深受感动。耿长锁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想通过他把自己的女儿从山西调到河北来，因为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和国家规定的制度，耿长锁对他说：“一个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能因为是老战友，就不讲原则，拿党和人民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回绝了他。一九六四年，邢台地区发生地震，五公大队也受到严重损失，国家给五公大队拨来一部分现款和物资，帮助社员翻盖房屋，大部分社员都领了，大队干部没有一个要的。当时，副书记乔利广负责安排社员翻盖房子，可是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八、九个年头过去了，全村有二百多户社员盖了新房，乔利广同志那幢早已震裂，用木柱顶着的老房子仍然没有翻盖，只用

土坯垒了个小房做饭用。社员们一次又一次催他，他总是说：“等社员们都安排好了，再说我的。”

多少年来，五公大队党总支成员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看作是每个干部的本份，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办小社时，耿长锁又当社长又当支部书记，总是上工比别人早，下工比别人晚，常常是拿块饽饽就出门，一边吃一边研究社里的工作，研究完就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在他的带动下，社里的干部始终和贫下中农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耿长锁同志和五公大队的干部们进一步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提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劳动是我们的本份。”耿长锁同志在省、县担任了领导职务后，他参加的会议多了，工作更忙了，但是他对自已的要求更严了，参加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他常说：“官再大，职务再高，头上的高粱花不能少，事情再多，工作再忙，比群众的汗水不能少流。”他见缝插针参加劳动，外出开会，出发以前的一段时间，总要干一会活，开会回来，只要天不黑，下车就往地里走。近两年来，耿长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一如既往，仍然严格要求自己，重活干不了，就到场里或猪场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为了使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形成一种制度，党总支制定了“两本一表制”（每人一个劳动记工本和工作日记本，每日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员填本，每月劳动填表上墙公布），定期检查，一年四季，干部和社员们学习在一起，干在一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看看每个干部的双手，那一个都有

厚厚的老茧；翻开每个干部的劳动手册，那一页也没有无故旷工的空白，每年劳动都在二百二十天以上，最多的达三百四十六天。干部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领导生产的主动权，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风。这样，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们受到广大社员的尊敬和爱戴，社员们亲切的称他们是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不搞特殊化的“三不干部”。

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公大队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理论队伍等新生事物，正在五公大地茁壮成长。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号召，在这个号召指引下，五公大队组织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在大队党总支的领导下，建立起由贫下中农、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三结合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师生开展了生机勃勃的教育革命。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们经常请大队党总支负责同志上政治课，请老贫农上阶级教育课，请老社长耿长锁讲五公村三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讲五公贫下中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这就大大提高了师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一九七五年有二十名高中毕业生在离校的前夕，向地区、县应届毕业生发了倡议书，决心一辈子跟着领袖毛主席，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教师方面，

认真落实和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了更快地普及教育，并便利贫下中农子女入学，一九七二年，学校增设了育红班，大至六岁，小至四岁的儿童均可进校。对家庭劳力少，弟妹多的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的困难，农忙时实行半日制、隔日制和送学上门，极大地方便了贫下中农子弟，提高了入学率，全村所有适合儿童全部进校学习。一九七五年，学校又增设了初中、高中班，实行九年一贯制，在普及初中的基础上又普及了高中教育。与此同时，将过去年年要学的植物、动物和农业基础三门课并为一门农技课，增设了适合农业需要的化肥课、会计课、电机课，还编写了《冀中主要农作物栽培管理》一书作教材，实行大小课堂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组织教学，使学生既学习了基础知识，又学到了农业生产技术。贫下中农感到满意。

合作医疗放新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五公大队贫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开展了医疗卫生革命，建立起合作医疗站。党总支加强对合作医疗站的领导和对赤脚医生的培养，使五公大队医疗卫生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几年来，他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使发病率逐渐减少，极大地保护了贫下中农的身心健康。古语说，“人活七十古来稀”，而今在五公却是“人活七十不稀奇”。全大队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不少至今仍和广大社员一起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合作医疗也不断的得到巩固和发展。刚成立合作医疗站时，社员治病自己出40%的

医药费用，60%由大队开支，目前社员医疗费80%由大队开支，计划在今后实行三土(土方、土药、土法上马)、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到一九八〇年全部免费。贫下中农热情地歌颂公社医疗是：“合作医疗放新花，银针草药威力大，少花钱治大病，贫下中农喜盈盈。”

五公大队党总支，平时很重视组织社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在三大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支学习骨干，其中有由女社员组成的八姐妹和红大娘等理论学习小组。他们紧密配合党总支的中心工作，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革命打头阵，生产打先锋，辅导群众学理论，成为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生力军。

理论学习组同时又是很好的宣传员，他们坚持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理论，搞宣传。在田间、地头，利用劳动休息时间给社员读报纸、讲政治，深得贫下中农的好评。

在五公大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始终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他们热情地颂扬说：“新生事物花盛开，斗风斗雨斗出来，阶级敌人胆颤惊，贫下中农乐开怀。”

一代新人一代新风

天变、地变、产量变，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五公大队广大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大大发扬，新人新事如烂漫山花，开遍五公大地。正如老社长耿长锁所说：“这场革命运动，

就象在农村刮了一场痛痛快快的春风，落了一场透透实实的春雨，叫人感到天新、地新、人新。这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

在五公大队，认真看书学习的空气越来越浓，老社长耿长锁在旧社会当牛做马半辈子，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解放后在扫盲班里才摘掉文盲帽子，为了掌握革命理论，在政治夜校里他认真学习，回到家里他刻苦钻研，一字一字的攻文化关，一步一步地攀登理论山。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文件传达后，他硬是凭着耳朵听，口中念，脑子记，把毛主席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坎上。在耿长锁同志的带动下，村子里的绝大部分男女社员，都参加政治夜校学习。他们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学理论，学政策，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大于社会主义。表扬好人好事，打击歪风邪气。政治夜校成为对社员进行政治教育的很好组织形式。目前，全大队普遍学习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部分人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马列著作，提高了三大觉悟，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水平。

在五公大队，社会主义正气已深入人心。破除陈规旧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已成风气，男同志和女同志一起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谬论，一样下地劳动，一样参加学习，一样开会工作，一样分担家务，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关系。在五公大队，青年结婚不要彩礼，举行新式婚礼；死了人（贫下中农）开追悼会，已形成制度。女青年徐嫚结婚时，她娘家打破了旧习惯，坚持新事新办，陪送了铁锹、大镐、锄头、镰刀，并勉励她到婆家要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五公人民同传统的旧风俗、旧习惯决裂，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尚正在逐步树立起来。“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五公大队的贫下中农常说：“咱不能站在五公看五公，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光靠咱五公大队建不成社会主义。”他们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的责任，无偿支援兄弟队的事迹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的。一九七二年，是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大旱年。在严重的干旱面前，水是多么珍贵啊！然而，在五公大队贫下中农看来，还有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以大局为重，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把电力让给兄弟队，自己用柴油机浇地，几个月的时间，烧柴油二万三千多斤，多花钱三千多元，多用工两千多个，其结果，不但自己大旱年取得大丰收，而且也保住了周围几个兄弟队的庄稼，取得了好收成。五公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样，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和兄弟队携手并肩，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共同前进。物质上的支援是一方面，另外他们还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帮助，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三年，在庆祝五公人民组织起来十周年时，人们把五公大队誉为“社会主义之花”，把它的邻村耿口大队比做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二十年过去了，五公这枝社会主义之花越开越鲜艳，而耿口大队这朵“花骨朵”一直没有开放，粮食亩产一二百斤。五公大队不仅经常在物质上帮助他们，而且还经常派人去帮助他们从路线上、方向上认识问题，协助他们抓阶级斗争。一九七一年，他们揪出了暗藏十多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煞住了搞资本主义的单干风，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过了“黄河”，改变了过去吃粮靠国

家，花钱靠救济的落后面貌。在五公大队的帮助下，这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终于开放了。旧社会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狭隘观念，在这里被唾弃了。

在五公大队，到处都体现了爱国家，爱集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么多年来，每逢粮食上场时，各生产队都把打场的好把式分配到场里，把头场的粮食扬了簸、簸了又扬，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一九七三年的秋天，第一生产队的一个社员没注意，把一簸箕带土的粮食装进了公粮口袋，妇女队长徐树宽知道后，立即把口袋里的粮食倒出来，重新筛了一遍，说：“咱们贫下中农向国家交的是红心粮，决不能让它掺上杂质。”过去，遇到天阴下雨，人们往家里跑，现在甭管黑天白日，天气若有变化，不用敲钟不用叫，社员们主动往地里、场里跑。地里有了积水，已有人排出去了，场里有粮食，早有人苫好了，队里的粪坑该起了，一夜之间，也不知道谁已起光了。几千年来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在五公正在逐渐被扫除，代之以一心为公，热爱集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崇高品质。过去的“爱家迷”，现在成了“爱社迷”；过去的爱社迷，现在成了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大寨人”。老贫农共产党员徐庄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人，徐庄同志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半辈子，受尽了打骂和凌辱。解放后，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生产队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社员们记不得他曾做了多少“份外”的事，记不得他曾干了多少“份外”的活，直到临终前，他还关心着队里的养猪场，关心着队里的养鱼池。八十多岁的老贫农李柱子，家里劳力多，有人劝他趁晚年享享清福。他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干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五公，但我们不能吃老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把劲使在集体上，朝着共产主义向前奔。”青年党员乔转社，在劳动中看到一个人掉到井里，他顾不得脱掉棉衣就跳下井里，把老人救了上来。在他们看来，人在世一生，如果光图自己吃饱喝足，那是太渺小了，只有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生活才有意义。

集体经济飞跃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以来，五公大队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飞跃发展，集体经济也不断巩固壮大。然而，五公大队发展农业生产也是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的。

一九六五年，五公大队广大干部社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大寨人学习，抓阶级斗争，促农业生产，粮食亩产由四百斤上升到七百四十斤。可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五公大队生产发展不快，粮食亩产总是在六、七百斤上下徘徊，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一九七〇年春天，大队党总支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带领广大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实行开门整风，发动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开展大总结，大讨论，揭矛盾，找差距，决心改变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的状况。广大贫下中农认为，这几年粮食产量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满足于既得的成绩。他们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大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从不能满足已取得

的成绩,年年迈出新步伐,年年都作出新贡献。我们大队就缺乏大寨人这种永不满足、不断前进的精神,取得一点成绩就自满起来,摇摇摆摆,走走停停。这可是个方向路线问题啊!”广大贫下中农的尖锐批评,使总支领导深受教育,认识到骄傲自满是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绊脚石。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批判了“生产到顶”等错误思想。并认真总结了本大队三十年来几次革命几次增产和由于自满右倾保守思想拉后腿的经验教训:一九五三年,办大社时,粮食产量由单干时的亩产一百多斤上升到二百多斤,当时有人认为“沙土疙瘩上打这么多粮食就不少了”,曾一度影响了生产。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五九年粮食产量上升到四百多斤,又有人认为“再增产不容易了”。结果,粮食产量又一度徘徊不前。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的指引下,六五年粮食亩产达到了七百四十斤,但近几年来由于存在着“生产到顶”的思想,粮食亩产连续几年过不去“江”。通过回忆,广大干部群众深深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认识到事物在发展,革命无止境,只有不断反骄破满,才能不断革命。他们说:“过去我们是三次革命三层天,今年要四次革命闯千关。”

破了自满情绪,鼓起了革命干劲。这年,五公大队贫下中农学习大寨人继续革命的精神,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取得了亩产九百一十五斤的好收成。秋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土、水、肥”上开了仗。几年来,他们铲平了四道沙岗,填平五

条河沟，深翻改土一千二百多亩，动土六十五万方，把全村三千六百五十亩土地普遍深翻一次，深度达七寸以上，加厚了活土层，全部土地成为“海绵田”。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方针，共打机井五十五眼，并实现了机电双配套，保证了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他们认真落实了养猪积肥的奖励政策，大抓养猪积肥，现在户户有圈、圈圈有猪，全村共有二千六百多头猪。各生产队都建了集体养猪场，建立了积肥专业队，用“五合一”的积肥方法，把牲口粪尿、人粪尿、猪圈肥、秸秆和土掺合在一起沤，这样积出的肥发酵快，质量高，平均每亩地施肥十立方米以上，加速了大办农业、粮棉增产的步伐。此外，还大搞了种植改革，用“新套套”去代替旧框框。把过去的一种一收改为二种二收或三种三收，实现了“春天无白地，夏来一片青”，一亩地等于二亩地用，大大提高了农田的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的产量。

大批促大干，大干换来大变。五公大队党总支带领广大社员群众不断反骄破满，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推向新高潮，极大地改变了五公的面貌。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闯过了千斤关，一九七二年在严重的干旱情况下，五公大队贫下中农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得了粮食亩产一千一百零八斤的好收成，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一九七五年在严重的旱、虫灾害下，粮食亩产仍达一千二百八十七斤。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高，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共向国家贡献粮食五百零一万斤，皮棉五十二万斤。仅一九七五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一百零九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多贡

献 89 万斤,比一九六四年多贡献 104 万斤。其它各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四三年成立“土地合伙组”时,他们只有三把大镐,提水用辘轳,打场是牛拉碌碡。现在全大队有公共积累一百二十多万元,有储备粮六十三万斤。有大小拖拉机四台,柴油机、电动机一百多台,磨面机、脱粒机、喷雾器等其它农具一百四十多台,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现在全大队社员共有自行车三百七十五辆,有缝纫机一百九十六台,有存款二十四万元。最早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老四户”刚成立合伙组时,四家二十二口人,五天才吃了十五斤粮食,住的是走风漏气的破房子,盖的是补钉罗补钉的破被子。现在他们家家有存粮,户户有存款,四家住上了六十二间砖瓦房,吃、穿、用样样有余。“电灯亮堂堂,机器隆隆响,粮食满着囤,衣服满着箱,银行有存款,家家红砖房。”正是今日五公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视察了五公大队,听取了五公党总支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汇报。陈永贵同志热情赞扬了五公人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勉励五公人民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戒骄戒躁,不断前进。五公人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他们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当前,五公人民正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为农业大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